Y 953770

学校代码： 10246
学　　号： 032039003

復旦大學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北平历史城市意象研究：1928-1937

院　　系：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专　　业： 人文地理学
姓　　名： 丁雁南
指 导 教 师： 张晓虹　副教授

完 成 日 期： 2006 年 5 月 18 日

图表目录

表 1…… 16

图 1…… 15
图 2…… 20
图 3…… 22
图 4…… 24
图 5…… 29
图 6…… 33
图 7…… 39
图 8…… 43
图 9…… 43

中文摘要

本文研究对象是1928－1937年期间的北平历史城市意象，所依据的材料包括研究时段内关于北平的文学、市政档案、地图等材料，研究方法包括现代城市意象研究方法，并综合文学、历史学、地理学的学科思路和研究成果。

北平城市意象研究范围为城墙以内，由通过城门的道路和主要商业街道构成道路系统，以内城南城墙为边界，以皇城、北海、天桥、宣南等地为主要区域，以前门为节点，以前门和景山为标志物。其中，以城门命名的道路占据重要地位，城墙起着隔离、分割城市空间的作用，而城门下的道路则沟通了城市和乡村、内城和外城。出现频率较高的区域经历了兴衰不同的发展过程；前门作为交通枢纽是北平城市节点所在，并且和景山一起承担了北平城市空间标志物的作用。

通过本文对北平城市意象要素的分析，参考当时的市政档案、地图、游览手册等，发现城市意象和城市实体空间之间存在着重叠和错位两种关系。造成城市意象空间和城市实体空间错位的原因包括国家政治地理格局、地理想象、恋地情结等不同层面的因素。本文分析了它们在北平城市意象生产中的作用。

采用文学材料进行人文地理学研究虽有先例，但多为直接引用文学意象，本文则是将其作为抽样样本来技术化地处理。对于这种方法的总结和反思构成了本文最后一部分。

关键词：北平 历史城市意象 国家政治地理结构 想象地理 恋地情结

中图分类号：K928.6

Abstract

This essay aims to input a deep examine on the city image of Peiping during year 1928-1937, in both visual and spiritual levels, and to come up with a new concept Historical City Image.

Based on perusal of 130 pieces of prose mainly written between 1928 and 1937, a series of basic elements contributing to the framework of the city image of Peiping are clear. They can be sorted after the system first proposed by Kevin Lynch in 1960. Boulevards named after city gates and a few certain business streets consist the bulk of the Peiping paths;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ity wall of Tartar city is the edge of Peiping, if there is any; the Forbidden City, Beihai Park, Tian-qiao, Liuli-Chang district are the dominating districts; Zhengyang Men is the node of Peiping; and also it, in companion with Coal Hill, are the landmarks of Peiping.

Meanwhile, this essay is also aware of the incoherence between the image of Peiping, and the material reality of Peiping city. After comparing the two types of text of Peiping, three clues are aroused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coherence. There are the National Political Geography Framework, the Imaginary Geography, and Topophilia.

A re-examine of applying literature texts into city image studies serves as the last part of this essay.

Keywords: Peiping, Historical City Image, National Political Geography, Imaginary Geography, Topophilia.

K928.6

绪论

1. 城市意象研究的兴起

二战后，作为“空间科学”的人文地理学在北美兴起，大部分研究都有实证主义风格，寻求描述空间结构的模式，解释人的行为中距离因素的影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对于实证主义、计量方法的反思，导致行为地理学的诞生。它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人类行为和物理空间的过程性解释，强调环境作为人的决策和行动发生的场所，而不只是单向度的、机械性的支配结构。行为地理学中很多学者采用“感知地图”（Cognitive Map）概念分析行为，这种思路的基本论点包括：1，存在着环境意象；2，这些意象可以被准确地识别；3，在环境意象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基于这些认识，凯文·林奇（Kevin Lynch）于1960年发表了《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2]一书，随即被视作城市意象研究的滥觞。

六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一方面对于实证主义、科学方法的反思更深入，一方面研究对象由群体转变为个体的微观问题。七十年代开始兴起了新的地理学潮流，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人本主义地理学将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脉络中的人本因素继承并放大，甚至否定用计量方法统计出来“规律”的合理性。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提出“观念论”，人的感知能力将人和外部世界现象联系起来，而感知本身又决定了人的行为，因而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将隐藏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下的个体感知、行为动机挖掘出来。

与此同时，现象学的兴起吸引了人本主义地理学家将其引入。现象学认为“一切知识来自经验世界，并且不可能独立于那个世界之外”。美国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认为，地理犹如镜子，对景观的研究就是对创造景观的社会的自身的研究，就像是研究文学艺术也就是研究人类生活那样。段义孚说，以科学方法来研究人是要尽量减低人的觉悟和心智的作用，与此相反，人本主义地理学特别要了解地理活动和地理现象对人的觉悟的反映。在后期的研究中，段义孚更进一步发掘人类与环境的情感纽带——恋地情结（Topophilia）[3]，以此阐释纷繁复杂的人地关系中感性因素的一方面。

回到城市意象研究上来。城市意象研究植根于城市空间（地）同它的创造者和参与者（人）之间的关系，考察人对于城市空间的感知和表达。它采用分析

---

[1] R.J.约翰斯顿著，唐晓峰等译，《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234页。

[2] 凯文·林奇著，方益萍等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

[3]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结构的方法，研究人的意识中的以及日常所使用的空间信息的属性，并且以描述、统计、绘图等方式，将原本模糊、抽象的个体经验具象化、普遍化，使之成为可以复现、可资借鉴的地理学成果。城市意象研究是城市研究（Urban Study）的重要组成部分。

凯文·林奇不仅从概念上界定了城市意象，而且探索了城市意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行为地理学突破了实证主义对于人地关系的影响因素的简化处理，引入更多的资料进行研究。虽然人对于城市空间的感知千头万绪，而且个案之间完全可能相差甚远，凯文·林奇仍然找到构成城市意象的五种基本元素：道路（paths）、边界(edges)、区域(districts)、节点(nodes)和标志物(landmarks)[4]。研究方法上，凯文·林奇分两个步骤，首先由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对城市进行勘查，得出预先假设的各要素的分布状态；同时大范围采访民众，要求他们绘制简单的地图并且回答相关问题；第二步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选择少数人进行访谈，请他们进行实地的勘查和描述、讨论。最终，这些材料将被综合形成一系列的地图和报告，以此产生出地区基本的公共意象，说明一般的形象问题和强度，以及关键元素和元素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细部特征和变化的可能性。

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研究方法虽然有诸多不足之处，招致对其研究对象选取等的批评[5]，却因简便、有效而被广泛接受和沿用。国内学界采用这种方法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郇、许学强的《广州市城市意象空间分析》[6]，林玉莲的《武汉城市意象的研究》[7]，顾朝林、宋国臣的《北京城市意象空间调查与分析》[8]、《北京城市意象空间和构成要素研究》[9]，崔育新、邱文明的《福州城市中心区可印象性分析》[10]等。

顾朝林、宋国臣的两篇文章都是以作者 1998 年 11 月至 1999 年 2 月在北京进行的实地调研为基础。作者将调查对象分为北京市居民、流动人口和在校大学生三类，使用照片辨认、问卷、认知地图绘制、访谈等方法。总计回收 108 份有效问卷，三类对象分别为 48、50、10 人[11]。

林玉莲《武汉城市意象的研究》更早使用同类的方法。林文在武昌、汉口、汉阳三地分别选取了 49、53、45 人，结果显示：武汉城市空间由长江、汉江（道路和边缘）天然分割，调查对象对于自身所在地区（区域）的熟知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地区，长江和长江大桥是出现频次最高的节点，标志物则多为年代久远且含

---

[4]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第 35 页。

[5] 汪原，《凯文·林奇<城市意象>之批判》。《新建筑》，2003 年 3 期。

[6] 李郇、许学强，《广州市城市意象空间分析》。《人文地理》，1993 年，第 8 卷第 3 期。

[7] 林玉莲，《武汉城市意象的研究》。《新建筑》，1999 年，第 1 期。

[8] 顾朝林、宋国臣，《北京城市意象空间调查与分析》。《规划师》，2001 年，第 17 卷第 2 期。

[9] 顾朝林、宋国臣，《北京城市意象空间和构成要素研究》。《地理学报》，2001 年，第 56 卷第 1 期。

[10] 崔育新、邱文明，《福州城市中心区可印象性分析》。福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 年，第 4 期。

[11] 根据《北京城市意象空间调查与分析》一文中表 1“照片指认人数统计”，可以很容易得出人数数值。

义明确的建筑，这一点和北京城市意象中宫殿、坛庙所起的作用类似。

本文部分采用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概念和研究方法，“抽样样本”数量为130份，并且按凯文·林奇的要素类型分别详述。

2. 城市意象与文学意象

“意象”一词是明清以来文学批评中最常使用的词汇之一。白话文运动之后，意象作为中国传统美学范畴之一，保留在现代汉语中。而今它仍然是文学、美学中最常用的词汇之一，只不过适用范围由古典文学批评而拓展到近现代文学批评中[12]。同时，其词义扩大、延伸或转移，也变得更宽泛。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提到：“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郭绍虞注：“意象，指作者想象中的境界。”[13]显然，“意象”和“声律”并举，用来指称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原则。这是最早出现的作为文学概念的“意象”。

文学批评史家对于文学意象的内涵的表述切中肯綮。“（意象）不是一般的事物表象，而是在饱含着情感的想象中孕育成形的，含蕴着主体情意的象。这种象，是以客观物象为素材、原料的，但同原物相比，它又多出一种成分，即渗融于其中的主体情意。”[14]意象以客观原物为原型，而被赋予了超越原型本身的涵义。姑且把这种超越看作是对原型的一种主观投影，或者主观感知。

意象的运用在诗歌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与刘勰同时代的诗人谢眺的《宣城郡内登眺》中有句“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严云受分析到，“‘平楚’即平野意象，寥远苍茫，与登望者‘惝怳魂屡迁’、‘怅望心已极’的心态恰相谐和。”[15] 现代诗歌亦然，戴望舒因其《雨巷》而得名“雨巷诗人”。尽管这首诗并非作者自认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却不妨碍作者因诗得名，诗因作者流传。特别是这首诗对于“丁香空结雨中愁”古典意象的现代演绎，具有经典的范例意义。

显然，以上的“意象”概念，和对“city image”中image的翻译“意象”，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或许只能从对于image概念的翻译来理解。《城市意象》原文名为 *The Image of The City*，这本书也曾被翻译为《城市印象》[16]。在汉语里，“印象”和“意象”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普遍适用于对于外在世

---

[12] 梁文宁，《近代诗歌意象与近代文人心态》。《学术论坛》，2002年，第3期。

[13]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57页。

[14] 严云受：《诗词意象的魅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19页。

[15] 严云受：《诗词意象的魅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20页。

[16] 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4：第149页。

界的宽泛的主观感受，而后者多数情况下是典型的、带有主观情感投射的形象。

即使是用“意象”来翻译 image 一词，还是不能避免中文语境中 “意象”和英文 image 的涵义错位。Image 在英文中主要有五种涵义：①像，肖像，偶像（尤指木、石雕刻的）；②心目中的形象或概念；③总印象；形象，声誉；④意象；比喻；明喻；隐喻；⑤映像；影像；镜像。[17]不难看出，“城市意象”所指的当是第二种“心目中的形象或概念”，而中文“意象”多指第四种，往往是比喻的、象征的，至少也是带有感情色彩的。

西方的“空间意象”（Spatial Image）概念有其自身的进化过程。1956 年 S.W.Wooldridge 最先使用“心理地图”（Mental Map）概念，其后 Peter Gould 提出“理解人们对周边空间的心理地图是理解其空间行为的关键之一”[18]，他认为人们的行为决策是基于自身认识到的空间，而非客观现实（Objective Reality）。此后 R.M.Downs 将心理地图扩大为“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认知地图是个人在其日常环境空间中由一系列获取、编码、保存、回想和解码过程组成的心理过程的产物[19]。Downs 和 D. Stea 并且区分了认知地图和测绘地图（Cartographic Map）。可见，Image 在西方人文地理学中由单纯的空间术语延伸成为包含空间感知形成过程的综合概念。因此，城市意象（City Image）概念就有了其独立的内涵和外延，并非简单的基于客体城市的感知。

在凯文·林奇看来，城市意象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美国城市的视觉品质，主要着眼于城市景观表面的清晰或是“可读性”，亦即容易认知城市各部分并形成一个凝聚形态的特性”。[20]换言之，视觉的、“可读性”、“可意象性”才是城市意象研究关注的核心。顾朝林、宋国臣关于北京城市意象的研究中，调查显示北京道路格局“可意象性”强，表现为迷路情况少，而访谈中得到的认知草图和实际道路结构基本一致。

由于对于“意象”概念的理解和使用的不同，国内学界出现了同以“意象”研究为名，内容和方法却都相去甚远的人文地理学成果。沿袭中国传统的“意象”概念而来的研究，多从文学角度、采用文学材料进行意象的发生学研究，或者进一步拓展到意象的传播和使用。

---

[17] 参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第 738 页。

[18] Robert P. Larkin, Gary L. Peters: *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Human Geography*,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83: 第 154 页, “he argues that one of the keys to understanding spatial behavior is understanding the mental images people have of the spaces surrounding them.”

[19] 同上。第 155 页。

[20] 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4：第 2 页。

张伟然在《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21]一文，使用诗文、典册、笔记等作为地理意象研究的资料，引用大量唐人诗句，分析了唐代南北方代表性的区域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得出北方四区并列而南方区域层级的不同结构。这篇文章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试图采取“同情”的姿态，进入“当时人”的情境中看待地理单元，探讨“感觉文化区”。在专著《湖南历史文化地理》[22]和《湖北历史文化地理》[23]中，作者也使用了大量的诗集、文集、杂录、日记、方志等文学或类似材料，特别是《湖北历史文化地理》中第六章对于“感觉文化区”的讨论，可视作是对上述“唐人”一文的先期尝试。

张伟然、林涓合作的《巫山神女：一种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24]反过来从地貌环境、气候条件和楚地风俗三方面分析了“巫山神女”和“云雨”意象的形成过程，将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引入到古代文学研究中。文章以地理环境对于精神范畴的孕育作用阐释文学意象的发生过程，给予文学意象以实际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超越了通常对于地理景观的“观光游览”式的理解，将文学和地理的关系推进到新的层面。

左鹏的《社会空间的文化意象——以乐府诗<长安道>为例》和潘晟的《感受与事实之间——宋人诗文所记汉水中下游河流景观及其解释》也是对中国古代经典人文意象的代表性研究。以左文为例，文章详细考察了乐府诗中对于“长安”的不同描述角度，以此分析诗歌作者同长安城市空间的关系，区分“家园-内部者”、“家园-外部者”、“他乡-内部者”、“他乡-外部者”四种人与特定社会空间的关系，并指出只有“家园-内部者”才是长安意象的真正代言人。

潘晟的文章将对宋人诗文关于汉水中下游河段的记载的解读和历史地理学考察结合，认为汉水中下游河流景观整体上表现为河漫滩与河曲发育充分，水位与含沙量的季节性变化较为明显。潘文从地理基础、开发状况、耕作方式、交通条件、战争因素等方面对两宋时期汉水流域植被情况和含沙量作了初步的解释。

李刚《中古乐府诗中的地理意象》[25]考察了中古乐府诗中的城市、塞、江南和巫山巫峡及蜀道等意象，认为长安、洛阳的城市意象均以历史时期、主要是西汉时期的城市景观为蓝本，而边塞意象中人物的思乡之情、爱恋之情参与了边塞意象的建构，江南以类型化的水乡形象出现，而巫山巫峡则弱化为“巫山神女”意象的副产品。

---

[21] 张伟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见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空间运作》，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第307-412页。
[22] 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
[23] 张伟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4] 林涓、张伟然，《巫山神女：一种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
[25] 李刚，《中古乐府诗中的地理意象》。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利用小说进行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研究，关注其中的“地理空间观”，以妹尾達彦的《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26]，和朱玉麒的《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27] 为代表，二者都将研究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另一个都城——长安。

以上所述例已使人文地理学，尤其是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走向深入，但是这些研究别无例外地都受到中国传统“意象”概念的影响，即使从地理角度入手，也是以地理知识解释带文学色彩的意象。真正采用《城市意象》为代表的意象概念，或者说将“意象”视作空间要素，可以分割、拼接、组合的研究，则并不多见。

3. 北京（北平）研究综述

北京（北平）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北京学”研究的兴起，出版了大量有关北京的书籍，包括方志、笔记、调查报告、游记、老照片、老地图，还有为数众多的学术成果，涵盖了城市史、文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众多领域。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侯仁之先生对于北京历史地理研究有开创性贡献，他主编了《北京城市历史地理》[28]、《北京历史地图集》[29]一、二集等基础性学术著作。《北京城市历史地理》虽然关注到北京内部区域特征，限于研究时段，仅截止清末而对于民国并无涉及。《北京历史地图集》是综合性的地图册，既有政区沿革，也有自然地理、考古等学科内容。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30]关注北京地区人口的数量衰益和空间分布，研究时段包括民国。

王玲的《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的研究对象是以北京为中心的“首都圈”城市体系。“天津是因北京漕运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交通和商业城市，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它担负着为北京接纳漕粮的任务，并以它特有的渔盐之利和近代工业弥补北京的经济不足。保定是重要军镇、文化辅助城市和北京农副物资补给地。张家口除了充当军事要塞外，担负了对西北贸易的重任。承德则在清代成为北京不加名号的陪都，实际是一个政治分中心。至于唐山，完全是为适应京、津需要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城市。”[31]尽管这是史学著作，但对北京周边城市在“首都圈”城市体系中的作用见解精到，具有宏观层面上的空间意识，具有某些城市地

---

[26] 妹尾達彦，《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见《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1 版，P509-P553。

[27] 朱玉麒，《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 9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12 月，P85-P128。

[28] 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年 5 月。

[29]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一集、二集。北京出版社，1988 年、1997 年。

[30]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31] 王玲，《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第 6 页。

理学色彩。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吴建雍、袁熹、姜纬堂等合著的《北京城市生活史》[32]是国内第一部以北京人口、家庭、民族、社区以及城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迁为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第五章《近代北京城市生活》从“北京城市与社会的近代化”、“城市居民的兴衰变迁”、“家庭和人际关系”、“城市生活”、“市民精神生活”等五个方面全景展现了北京（北平）城市近代化的过程。

与之相应的是美籍学者史明正的《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33]。史明正的关注视角不如《北京城市生活史》开阔，但是集中在传统都城向近代城市的理念、功能上的改造，翔实地记录了北京（北平）城市近代化改造的历史过程。其论文《清末民初北京城市空间演变之解读》[34]从市政建设的角度解读北京在由清入民国的转型时期的城市空间格局和类型的变化，认为对于原有建筑的拆除和改建是造成北京城市空间变化原因之一。

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副教授董玥的《民国北京：城市及其历史》（*Republican Beijing: City and Its Histories*）[35]从规划者、经历者和描述者三方面综合考察了民国时期北京（北平）形象。第三章《被描述的城市》（*The Lettered City*）分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三部分展开；其中第三节 *Literature: Writhing New Beijing* 以《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为中文标题，2003年发表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36]，初步涉及到文学描述中隐藏的“国家政治地理结构”。

赵园的《北京：城与人》[37]从文学角度研究近现代北京文学史，与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并列为京、沪两地人文研究的重要著作。赵园深刻洞悉了“乡土-北京”之间的紧密关系，确认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二者之间所处的位置；并且极有创见地提出了“声音意象”的概念，有别于文学意象和城市意象。

当代北京城市意象空间研究，以顾朝林、宋国臣的《北京城市意象空间及其构成要素》和《北京城市意象空间调查与分析》两文为代表。在《北京城市意象空间及其构成要素》中，作者结合了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分别讨论了作为北京城市意象构成要素的“道路”、“边缘”、“区域”、“节点”和“地标”。当代北京的城市道路系统仍以北京“内城”所代表的网格状道路为特色，

---

[32] 吴建雍、袁熹、姜纬堂，《北京城市生活史》。开明出版社，1997年。

[33] 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34] 史明正，《清末民初北京城市空间演变之解读》。收入《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下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

[35] Madel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U.C. Berkeley Press, 2003.

[36] 董玥，《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收入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9-268页。

[37] 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辅之以二环、三环和四环等环状道路系统，易识别、“可意象性强”。边缘范畴则在被调查人群中反映甚微，人们往往同时把边缘和作为通道的道路混同。同样，道路的作用也体现在对于区域的划分上，以二环路为标志将北京老城区划分为“内城”和“外城”简单而客观地反映了人们的区域感知的差异。天安门广场、北京站等交通要道或人流集散地，成为北京空间分布的节点，这与经典的城市意象假设吻合。地铁站点、交叉路口高架桥、古典建筑以及重要的商业楼宇都能起到地标的作用。总的来说，作者认为“北京市的城市意象空间是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以长安街和二环、三环、四环路以及前门大街等道路骨架形成的网格状系统”，“影响北京城市意象空间的主要要素是道路、地标和节点。”[38]

《北京城市意象空间调查与分析》则将关注重点放在对北京城市空间形象的评判和形成原因的分析。研究显示，政治因素对于北京的整体形象极其重要，“（问卷回答）反映了人们‘关于北京是国家的首都’第一评判印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国家政治中心所在地。”政治性建筑、名胜古迹等历史文化遗产是北京人最经常推荐的场所，其中也明显看出场所的象征意义，比如“天安门”被视作“祖国的象征”。不过，具体到个人对于居住地的选择，则结合个人需求，分为追求生活便捷和要求生活质量两种不同倾向，很难说和其他城市有何区别。组成北京人口的三类人北京居民、流动人口和大学生的“群体意象空间存在明显差别，而在各个群体内部，影响意象空间的社会因子则不尽相同。年龄影响到意象空间的‘质’而对于‘量’影响不大；居住年限和流动人口的意象空间之间则相关性很小。上班距离对于人们对整个城市的意象影响不大，但影响到局部意象。”[39]

在王均的博士论文《从传统向近代过渡的都市：北京城的空间转变》[40]中，他提出“对于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城市，应用静态空间结构理论具有相对合理性；对于处于社会变革状态的城市，首先要重视触发引导其功能和结构演变的背景因素，即内因与外因状况，重视具体的社会条件、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传统对静态的理想模式的修正，在理论的指导下解释具体的城市结构及其演变过程。”民国时期北京（北平）正是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状态下的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城市，考察北京（北平）的历史城市意象，自然也要把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纳入研究的关注范围。

王均的《现象与意象：近现代时期北京城市的文学感知》[41]引入行为地理学和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理论，提取文学作品中包含的北京城市意象的要素，“在市

---

[38] 顾朝林，宋国臣：《北京城市意象空间及其构成要素》。《地理学报》，第 56 卷第 1 期，2001：第 64 页。
[39] 顾朝林，宋国臣《北京城市意象空间调查与分析》。《规划师》，第 17 卷第 2 期，2001：第 28 页。
[40] 王均，《从传统向近代过渡的都市：北京城的空间转变》。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0 年。
[41] 王均，《现象与意象：近现代时期北京城市的文学感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 年，第 17 卷 2 辑。

政建设、城市地标及若干地段认知等方面比较了意象与现象的差异及形成原因”。可能是因为对于城市意象与现象的区分不够明确，或者是对城市意象自有的“公众意象”[42]的内涵有所忽视，文章得出权威人物对于城市意象起主导作用的结论。尽管如此，这篇文章对历史城市意象研究，和使用文学材料进行城市意象研究的方法，都颇具尝试意义。

周尚意、王海宁、范砾瑶的《交通廊道对城市社会空间的侵入作用——以北京市德外大街改造工程为例》是另外一个采用了抽样问卷调查方法进行北京城市地理研究的案例。文章选取德外大街作为对象，考察城市道路改建工程对于两旁社区空间联系的割裂，以及城市社会对于交通廊道侵入的应对和调整。这是考察当代北京居民对于城市空间感知的新的角度。

通过对抽样样本的分析，作者发现尽管德外大街改造带来的实体空间改变非常显著，但居民的心理感受到的负面影响并不相同。研究显示，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居住年限以及安全感都影响到居民对于交通廊道侵入作用的反映，比如老年人较之青年人感觉更加不便。文章并且认为，城市社会在积极地接受交通廊道的侵入影响，类似的城市交通廊道建设“应注意维持居委会一级的社会空间单元的完整性。这样既不影响城市实体空间效率的提高，也可以维护城市社会空间的稳定和秩序。”[43]

上述研究成果不仅对本文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更使本文的研究目的更为清晰。在澄清了文学意象和城市意象区别之后，在总结了关于北京城市意象研究成果之后，本文试图勾勒出 1928-1937 年期间的“北平历史城市意象”，进而分析这个城市意象的产生流程。

4. 方法与材料

现有的城市意象研究多直接援引经典城市意象理论和研究方法。具体来说，理论上源自行为地理学和人本主义地理学，并且借鉴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现象学、景观生态学等的理论；研究时段上着重当下；研究方法倚重问卷、调查、访谈和绘制地图。上述理论和方法是在西方当代城市意象研究的过程中发展成熟起来的，易于在空间上横向复制，应用于中国的城市意象研究。

不过，历史城市意象不完全等同于城市意象。除去现代城市意象的空间要素分布特征之外，它的产生还有其特定的政治、文化教育、经济背景。这些因素不只是在空间分布上附丽、叠加于地理要素之上，同时也参与了地理要素的空间

[42]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第 5 页，“这项研究将忽略心理学家可能感兴趣的个体差异，在此首要阐明的就是‘公众意象’的定义，它应该是大多数城市居民心中拥有的共同印象。”

[43] 周尚意，王海宁，范砾瑶：《交通廊道对城市社会空间的侵入作用——以北京市德外大街改造工程为例》。见《地理研究》2003 年，第 22 卷第 1 期，第 102 页。

分布过程，更不必说对空间的感知了。另一方面，对历史城市意象的讨论也不能局限于城市空间内部，更大范围的地理空间格局（如“京”-“海”，南-北，故乡-他乡等）必须纳入到视野中。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中外学界对于“意象”概念的理解和使用的差异，将导致研究成果不管是在理论、方法还是最终的形态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一点，既是本文所要记取的经验和教训，也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本文一方面援引成熟的现代城市意象研究方法，对 1928-1937 年时期北平城市意象要素进行统计，并据此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本文综合市政档案、照片集、老地图、新闻报道等辅助材料，结合文学、历史学研究成果，对北平城市意象的形成和使用过程进行分析，揭示隐蔽在城市意象要素分布表象之后的心理机制。

上文已经提到，采用文学作品进行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是一种广为接受的方法。文学作品因其对景观的记录和再现能力，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中最常采用、易于解读的文本类型。Richard Lehan 提到城市和关于城市的文学的关系：

“城市和文学文本共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历史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44]

陈衡哲小说《小雨点》的发表开创了白话文创作，白话散文则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了成熟期，从作品数量和代表性作家的水准来说都是如此。相对于其他文体，散文的特征使其易于被选择为对象文本。首先散文文体通常具有很强的真实性，相对于戏剧、小说和诗歌而言较为优越；二是材料包含的信息量上大体相等，不会出现鸿篇巨制与四六短句并举的问题，这使材料之间具有可比性。

本文主要采用研究时段内撰写的关于北平的、或者可以进行对比的散文作为历史城市意象研究材料，有的是当时出版物，有的经过后人选编。具体说来，本文使用的散文来自《北平一顾》、《北京乎》、《故都北平社会相》、《中国一日·北平天津》、《北游鳞爪》、《北海闲詠》、《南京情调》、《抚摸北京》等文集，以及《宇宙风》杂志、《申报》、《大公报》等报刊，以及其他零散出处。

本文采取“替代”方式，将散文文本视作等同于现代城市意象研究中问卷调查、实地访谈所得到的抽样样本，通过对文本的精读，提取相关的城市空间要素。经过对所选散文写作时间的考订[45]，共选定 130 篇散文作为样本。从这些样

[44] **Richard Lehan**，《文学中的城市：思想史与文化史》。转引自陈平原，《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收入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

[45] 经过比较和核实，这 130 篇散文的撰写时间在 1928-1937 年间段，或与之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本中得出了一系列较为明确的北平意象构成要素，本文对北平城市意象的分析正是建立在对这些要素的统计基础上的。

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府留下了大量档案材料，此前使用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的成果，以 1999 年召开的“档案与北京史学术研讨会”为代表，会议论文集[46]中收录了相关论文。其中史明正《清末明初北京城市空间演变之解读》、张复合《北京近代市政工程之一大举措——1915 年改造正阳门瓮城和展修京都环城铁路》、李全中《宋哲元与北平市政建设》、吴家林、徐香花《何思源与北平的城市建设和管理》等，论证了民国时期北京（北平）城市空间的变化，以及历史人物对于城市发展的作用。本文也将利用北平城市市政建设有关的档案，对 1928-1937 年时期北平城市建设以及实体空间形态做必要的考察。

此外，本文也注意到民国时期居留北京（北平）的境外人士留下的大量文献。德籍摄影师 Hedda Morrison 的画册 *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47]收集了她在上世纪 30 到 40 年代在北平拍摄的近百张照片，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北平城市景观。美国作家 George Kates 的回忆录 *The Years That Were Fat: Peking 1933-1940* [48]记录的是他在 1930 年代初来到北平后的生活，对了解当时的北平城市生活状态非常有帮助。L.C. Arlington 的 *In Search of Old Peking*[49] 远远超越了一般的旅游指南类的书籍，其对于中国城市建设理论的深刻理解，和所包含信息的丰富程度令人震惊。这本书出版的最早，在 1935 年。

---

[46] 《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 年。

[47] Hedda Morrison: *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48] George N. Kates: *The Years That Were Fat*. Mass.: MIT Press, 1967.

[49] L. C. Arlington: *In Search of Old Peking*.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35.

第一章　北平历史城市意象要素

1. 北平城市意象研究范围

汉语中“城市”一词最初就有城墙-城防的含义。在近代火器发明使用之前，城墙一直是有效的保卫政权、人口、经济的军事设施，防御性的闭合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最重要的建筑特征之一。历代王朝无不以占据城市来实现其统治，又以政权的力量营建、扩建城墙来巩固其统治，“城墙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实在不可低估。”[50]

在现实中，城墙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军事防御、灾害防御（如洪水）等实用功能上，更重要的是以城墙作为边界区分了城市和乡村的空间类型。“不管什么形状的城，土城还是砖城，都有具体的位置和范围，终于形成为城市。城市一旦出现，就立即显示出不同于农村的特殊功能。”[51]这个说法虽然有例外，比如唐长安城和明清时期的北京外城城墙以内仍然有大片的土地是乡村景观，但大体上是有效的。“在帝制时代，中国绝大部分城市人口集中在有城墙的城市中，无城墙型的城市中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不算正统的城市。”[52]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空间逐步拓展，突破了城墙圈定的范围，关厢区域得到充分发展[53]。明嘉靖年间修筑北京外城之前，正阳门前已经聚集了初具规模的人口和商业；清代北京东直门、西直门外关厢的繁华几乎不输于城内。从现代土地利用类型来说，这些地区或许更应该被归入城市空间。然而，在传统城市的行政管理制度下，这些地区不可能被纳入城市管理体系之中。实际建成的城市空间和行政手段定义的城市空间存在错位和矛盾，这个事实是本文讨论城市空间的基础之一。出于简便考虑本文将北平城市空间限定在城墙范围以内，同时在需要的情况下也兼及对周边地区的讨论。

民国时期的北京城墙于明永乐年间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始建，到明中叶为保护城外居民，抵御鞑靼的军事骚扰，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展筑外城。内城南城墙和外城共用，城墙长共 68 里。北京在其后的近四百年中历经明亡清兴、第二次鸦片战争、庚子之变、民国废清等重大历史事件，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曾有歧视性的区分内外城居民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城市空间格局。民国时期，对北京（北平）的改建也限制在整顿、维修和改建、扩建的范围，拆除皇城墙、打通南北池子、南北长街、开辟和平门、有轨电车，主要集中在道路交通设施的改善。并大体上保持了和原有景观的协调。在城市景观更新的同时，基本保持了原有的

---

[50] 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第 78 页。
[51] 同上。第 77 页。
[52] 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收入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第 84 页。
[53] 关于北京关厢的专门研究，参见王永斌《北京的关厢乡镇和老字号》，东方出版社，2003 年。

内部空间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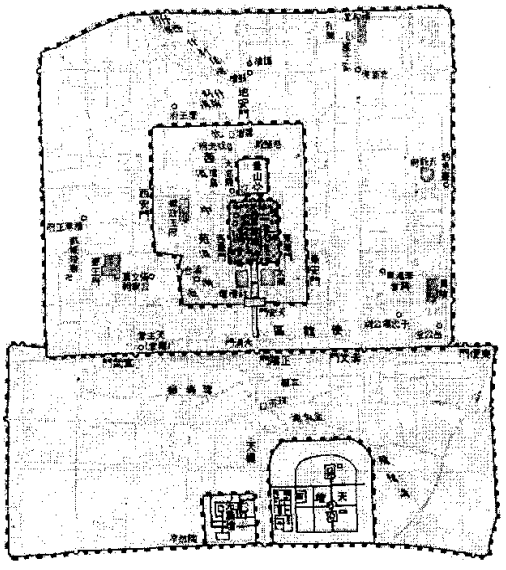

图 1，明清时期的
北京城市范围

将北平历史城市意象空间的研究范围主要限定在城墙以内，还有一个原因。正是当北京城墙最终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被完全拆除之后，北京的城市空间才大规模向郊区延展。北京内城城墙拆除以后，在其基础上修筑了“二环路”，成为今天北京城市快速通道圈层的第一环。相对于古代城墙的防御、隔绝作用，“二环路”所代表的现代交通模式无疑是一种对传统都市理想的反动。因此也可以说，城墙的命运是传统北京（北平）的现代处境的缩影；选取城墙以内的城市空间范围作为研究对象也意味着将关注点集中在那个几十年前的传统北京（北平），而它正是滋生八十年代以来“北京学”研究热潮的精神资源。

2. 北平城市空间要素统计

人对于城市的个体意象具有个人的特征，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一个由许多人的意象复合而成的群体共享的意象集合。这种公共的意象一般由常见的、易于被感知的要素构成，因而被最广泛地接受和认同，现代城市意象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据凯文·林奇通过对美国城市的研究，认为城市意象构成要素包括“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这些要素的感知共同参与了城市意象的构建。

对于中国历史城市意象研究来说，西方的现代城市意象研究方法可作为参考，也必须有所变通。本文采取了以文学材料“替代”抽样样本，对其中与城市

空间、城市景观有关的相关词语进行筛选。

通过对共计 130 个样本（见附录）中有关北平城市空间要素的搜集整理，并且将城市空间要素放宽到与城市感知有关的方面，最终得到了 1928-1937 年期间关于北平的文学描述中这些要素出现频次的简单统计。见下表：

表 1　北平城市意象要素统计

（样本总数=130）

北平城市空间要素	出现频次	频次百分比（频次/总数*100）
皇城	30	23.077
北海	26	20.000
正阳门	22	16.923
王府井	19	14.615
天桥	14	10.769
中山公园	14	10.769
琉璃厂	12	9.231
什刹海	12	9.231
宣武门	11	8.462
西直门	10	7.692
西单商场	8	6.154
景山	8	6.154
北京大学	8	6.154
北京饭店/六国饭店	7	5.385
先农坛	7	5.385
隆福寺	6	4.615
白云观	6	4.615
崇文门	5	3.846
东交民巷	5	3.846
天坛	5	3.846
师范大学	5	3.846
东交民巷	5	3.846
广安门	4	3.077
护国寺	4	3.077
西四牌楼	4	3.077

北平大学	4	3.077
中华门	3	2.308
东直门	3	2.308
阜成门	3	2.308
和平门	3	2.308
东四牌楼	3	2.308
崇效寺	3	2.308
真光剧场	3	2.308
陶然亭	3	2.308
西便门	2	1.538
德胜门	2	1.538
永定门	2	1.538
朝阳门	2	1.538
长安街	2	1.538
火神庙	2	1.538
关帝庙	2	1.538
西河沿	2	1.538
朝阳学院	2	1.538
协和大学	2	1.538
清华大学	10	7.692
颐和园	5	3.846
圆明园	5	3.846
燕京大学	3	2.308
万牲园	3	2.308
东岳庙	3	2.308
静宜园	2	1.538
沙尘	*16*	*12.308*
洋车	*15*	*11.538*
火车	*14*	*10.769*
风	*10*	*7.692*
汽车	*8*	*6.154*
京戏	*7*	*5.385*
骡、马、骆驼	*6*	*4.615*
电车	*5*	*3.846*

飞机	*4*	*3.077*
叫卖声	*4*	*3.077*
自行车/三轮车	*3*	*2.308*

说明：1，该统计自动剔除了出现次数仅为一次、代表性较弱的要素；

2，灰色底纹部分位于北平城墙以外，斜体部分为非城市空间实体。

3.北平城市意象要素分析

3.1 北平城市空间要素分类

从上述要素种类可以看出，构成对北平城市地理空间感知的因素除去基本的地点、场所外，还包括了自然环境、交通设施等因素。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存在同一实体使用不同名称的情况，在上述统计中对这些地点作合并处理。比如正阳门，又称前门，则提及“前门”的频次都纳入正阳门频次下。类似的情况还有三贝子花园纳入万牲园、平则门纳入阜成门、顺治门纳入宣武门、哈德门纳入崇文门等。另外，尽管景山、北海、中山公园等位于皇城以内，但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因而并未将其纳入皇城中。

事实上，在对于北京（北平）城市空间的记录和描述中早有分类的先例。正当“北京学”研究者感叹当代北京没有如同伦敦一样的融贯古今、通俗易懂的高水准游览手册时[54]，北平却在1935年就出版了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游览指南》，该手册分沿革、公署、交通、学校、商号、名胜古迹、冶游等项目介绍北平，编纂水平远胜于当今同类书籍。同年在北平和天津出版了 L.C. Arlington 的中国著作系列之一 *In Search of Old Peking*。这本书把北平内外共分为25个区域，按照同使馆区（The Legation Quarter）距离从近到远的依次介绍，涉及北平生活的各个方面。

赫达·莫里森(Hedda Morrison)于1933年到北平为哈同图片社(Hartungs Photo Studio in Peking）担任摄影师，1938 年合同终止后转而为一位英国女士毕博（Miss Bieber）工作，直到1946年离开中国。在北平期间，她拍摄了大量关于北平的照片，真实记录了当时北平城市景观。1985 年，其中的部分照片以《一个老北京的摄影家》(*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 为名在香港和纽约出版。书中，编者将赫达的照片分为“城墙、宫殿和公园”（Walls, Places and Parks)、“寺庙和牌楼”（Temples and P’ ai-lou)、“街道生活、商店和市场”（Street Life, Shops and Markets）、“食品和娱乐”（Food and Entertainment)、“艺术和工艺”（Arts and Crafts)、“其它”（Further Afield）共六个部分。

[54] 陈平原，《“五方杂处”说北京》。《书城》，2002年第3期。

以上这些分类和现代城市意象研究的分类显然大不相同，不过仍然可以为本文对北京空间要素分析起参照作用。

3.2 北平城市意象要素分析

根据北平城市意象要素统计表，在 130 个样本中出现频率超过 10%的有皇城、北海、正阳门、王府井、沙尘、洋车、天桥、中山公园和火车共计 9 个要素。除去沙尘、洋车和火车 3 个有关地理环境和交通设施之外，仍有 6 个极其显著的地理空间概念，显然，它们正是该时期内北平城市空间结构的最基本、最主要的部分。当然构成北平城市意象远不只是这些要素，以下按照现代城市意象理论的分类方法分别论述。

3.2. 1 道路

构成 1928-1937 年“黄金十年”时期北平城市道路主干的，是以前门大街、宣武门大街、崇文门大街、王府井大街、新华街等街道。这些街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城门名直接命名，或城门名加“内”、“外”命名，前者如前门大街，也称作正阳门大街，后者如宣武门外大街、地安门内大街等。这一类主要是侧重交通功能。另一类是以周边特色命名，如王府井大街、琉璃厂，新华街则是因穿过和平门可通往西长安街新华门而得名。这一类大多商业贸易集中。

从表 1 中的统计也可以反映出城门在北平街道命名中的广泛使用，“内九外七”十六座城门占据三十年代北平居民对于北平城市空间认知的重要部分。通常来说，城门是和以城门命名的街道同时提及的。换句话说，表 1 中统计的城门出现次数基本等同于以其命名的街道的出现频率。因此上述统计很少单独列出街道。

这一点不难理解，相对于出于军事上防御、隔绝目的建设的城墙，城门则是封闭城市与外界沟通、交往的必然通道。可以说城墙隔绝越是严密，通道数量越少，则城门所承担的交通作用越重要。北平城墙高大雄伟，穿过城门的道路是沟通内城和外城、城市和郊区的唯一通道，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别无选择，反映在空间感知上就是这一类道路的出现频次远远强于普通道路。

时至今日，北京的城墙、城门多已不存，但以城门命名的街道名称仍然在使用，甚至包括某些事实上从未真正建筑起来的“城门”，如复兴门和建国门。这不能不归因于传统的命名、认知方式在城市居民中的深刻影响。顾朝林、宋国臣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采集到的一幅认知草图，显示出已经拆除的安定门对于北京居民空间认知的定位作用，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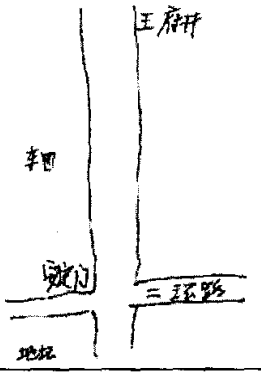

图 2，北京空间认知草图，
来源：《北京城市意象空间
和构成要素》，2001 年

由于靠近帝国时期高级官员出入紫禁城的东华门和高级官员的住宅，王府井大街在清末民初时就已经初具规模。民国时拆除了皇城东半部城墙，交通更为方便，加之东安市场、剧场影院、风味餐馆（如东来顺）的建立，王府井大街日趋繁华。类似的发展模式还见于东单市场、西单商场，由二处通往城门的东单大街、西单大街是内城的主要商业街道。崇文门内大街并且由于拥有税关而繁华起来，吸引到洋行的进驻，逐渐发展成为金融区。三十年代，崇文门大街和王府井大街被称为“（北平）东城两条最繁盛的马路。”[55]

东交民巷或许是北平道路中的特例。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是靠近内城南城墙水关的一条道路，自西向东从棋盘街直达崇文门内大街。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开始在这条道路两边设立外交机构，1900 年“义和团”运动之后沿使馆区加筑围墙。作为使馆区的中心干道，北平时期对于这条道路的描述通常和西方的影响联系起来。

吞吐在《北平的洋车夫》中提到：“拉牌儿车这个名词，不经解释，恐怕差不多就连久住北平的也未必懂。这是专指在东交民巷里与北京饭店前边，买过牌子有资格拉洋人的。”[56]洋车夫尚且因为服务的区域和对象不同而有等级的分差，更不用说造成这种差别的使馆区外国人和普通的北平市民之间的社会阶层的隔离了。

梁实秋在《北平的街道》里也提到了北平居民对于东交民巷的态度，颇值得玩味：

> “东交民巷是特殊区域，里面的马路特别平，里面的路灯特别亮，里面的楼房特别高，里面打扫得特别干净，但是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的北平人却能熟视无睹，见怪不怪。北平人并不对这一块自感优越的地方投以艳羡眼光，

[55] 王西彦，《和平的古城》。收入姜德明编《北京乎》，三联书店，1992：第 598 页。
[56] 吞吐，《北京的洋车夫》。原载 1936 年《宇宙风》第 22 期，收入梁雨健编《故都北平社会相》，重庆出版社，1989：第 175 页。

只有二毛子准洋鬼子才直眉瞪眼的往里面钻。地道的北平人，提着笼子架着鸟，宁可到城根儿去蹓跶，也不肯轻易踱进那一块瞧着令人生气的地方。”[57]

钱歌川对于东交民巷的态度，在和天桥等贫民聚居区的比较中更其严厉，“惯在北平王府井大街或东交民巷一带走动的人，他们是不会知道人间有地狱的。”[58] 他还将这种情况扩大到受西方影响的更广的区域，“住在上海租界上的人，只晓得有新亚、扬子江、南京那些大旅馆，就是北平城内的居民，也多只晓得有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等等。”虽然这中间饱含了社会批判意识，却也同时揭示出了处于社会阶层上端的外国人、中国上层的居住、消费场所同普通市民的分野，使馆区的六国饭店和东长安街对面的北京饭店是其代表，它们的强势地位影响着市民对上海、北平空间的感知。

铢庵的《北游錄话》之一则透露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东交民巷所象征的西方影响的矛盾态度。“这便是近四十年来埋藏着许多国际阴谋之东交民巷了。你看这些巍焕深邃的使馆，都是百年前的王公邸第呀！朱户依然，石狮无恙。当其属于王公也，乾嘉极盛，同光一衰。当其属于外交团也，民国十七年以前极盛，十七年后一衰。”[59]固然，西方的强势介入打破了北京城原有的帝京秩序，但是当首都南迁导致使馆区冷清时，却又使人感叹北平街市的萧条。

东交民巷在 130 份样本中仅仅出现 5 次，表面看来它所象征的西方影响似乎远不及前述的其他道路。不过，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只是城市居民对于某些空间要素的认知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或遮蔽。相对于深受西方影响的港口城市而言，北平是作为传统中国的象征而被知识分子接受、认知的，因此单从出现频次并不能完整反映它在北平城市中的实际作用。作为象征的北平，以及“中国本位”的观念对于北平城市认知的影响，在下文中还将专门论及。

3.2. 2 边界

顾朝林、宋国臣所做的《北京城市意象空间调查与分析》一文中曾注意到通道对于城市意象的屏蔽作用，文章以“对二环路以内美术馆、天主堂、鼓楼、德胜门和新东安市场等的照片认出比率差别”得出人们城市意象图中存在明显的“内城区”和“外城区”的差别。这里，二环路是区分“内城区”和“外城区”的边界，见下图。

不过对北平城市意象来说，边界则非常不明确。民国时期北平城市建成区基本局限于内外城城墙范围以内，没有现代北京城市空间跨越环线道路的情况，因此除内城南城墙以外，其他城墙与其说承担了城市内部空间的分割作用，不如

[57] 梁实秋，《北平的街道》。收入姜德明编《北京乎》，三联书店，1992：第 575 页。
[58] 钱歌川，《游牧遗风》。收入姜德明编《北京乎》，三联书店，1992：第 170 页。
[59] 铢庵，《北游錄话》之一。《宇宙风》，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第 19 期。

说仅仅是区分了北平城市空间和郊区（行政意义上的）。如果注意到在城墙范围以内，仍然有大量的非城市景观区域，如内城北部的太平湖、什刹海、积水潭一带，以及外城东南的金鱼池到龙潭湖一带，则上述的城墙的区分作用还要继续打折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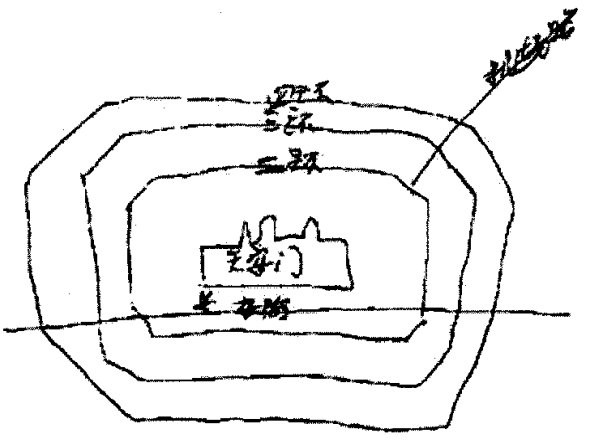

图 3，北京城市意象草图，来源：《北京城市意象空间和构成要素》，2001 年

唯一可能称作北平城市空间的边界的，是内城南城墙。这段城墙两边分布了北平主要的政府机关、外交机构、商业街道。正阳门是内城南城墙的中点，自正阳门以西，城墙以南分别是平汉火车站、西河沿、大栅栏、琉璃厂、南新华街和宣武门外大街，城墙以北分别是北平特别市市政府、中国银行、西单；自正阳门以东，城墙以南有京奉火车站、打磨厂、花儿市，城墙以北则是使馆区、王府井大街、东单、纸市。正阳门前则是前门大街，门内是棋盘街和中华门。

对正阳门、和平门的整治、开辟可以作为内城南城墙对于北平城市空间的分割作用的佐证。内城南城墙原有宣武门、正阳门和崇文门三座门，内外城的交通循门而过。对于当时正阳门交通情况的描述，可以见拥挤情况于一斑："走到棋盘街，照例是'插车'（注：一作岔车[60]），壅塞难行，前呼后骂，等得心焦，常常要一个小时以上才有松动的现象。"[61]1914 年京都市政公所成立后的第一件重大工程就是改建正阳门。经过拆除瓮城，整理棋盘街，拓宽道路，开辟新门洞这一番整理，正阳门内外的交通情况有所好转，1924 年之后有轨电车线路也经过正阳门。

1926 年（一说始于 1924 年[62]）和平门的开辟完全是为了解决内外城之间的日益频密的交通问题。原先由琉璃厂、师范大学去往内城，不得不绕行宣武门或

[60] 参见铢庵，《北游錄话》。《宇宙风》，第 19 期。
[61] 梁实秋，《北平的街道》。第 573 页。
[62] 参见吴建雍等著《北京城市生活史》。北京，开明出版社，1997：第 299 页。

者正阳门，和平门的修筑解决了这类问题。和平门于 1927 年改称兴华门，1928 年恢复原名。

不管是开辟和平门还是改建正阳门，或是位于使馆区的御河水关的开放，都是证明了内城南城墙对于北平城市空间的阻隔作用，而原有的三个城门已不能满足交通的需要。因此，这段城墙才是北平城市空间的边界。

皇城城墙没有拆除时，也是阻隔内城东西城区的障碍[63]，东西城的交通必须绕道中华门前棋盘街或者地安门外大街，非常不便。从 1917 年开始拆除西皇城城墙开始，经过 1924 年、1927 年分别拆除东皇城和北皇城，皇城城墙只留下了从南池子以东到新华门以西的不长一段。加上开放东西长安门，长安街终于连为一条道路。景山前街经过改造，将马路由北上门前移至门后，也成为东西向的一条主要通道。至此，皇城对于交通的阻隔作用基本消除，不再是分割北平城市空间的边界。

3.2. 3 区域

中国古代城市营建理论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提法已经含有根据功能对城市空间进行分区的意识，同时古代城市布局从选址到方位到建筑都受到宇宙论的影响[64]。清帝逊位之后，北京城市发展开始突破帝国时代的严格管理，而向现代城市演进，也即所谓“走向近代化”。从城市区域来说，出现了功能退化、转变、新增等多种情况。经过清末到三十年代二十余年的发展，区域特色的各种情况都趋于成熟稳定。

以北京城市意象要素统计表中出现次数最高的皇城地区而言，特别是紫禁城，在清帝逊位之后逐渐失去昔日皇家禁地的威严，而成为向市民开放的公共空间。除去上文已经提及的皇城城墙的拆除，原皇室苑囿“三海”开放，社稷坛辟为中央公园（中山公园），紫禁城设故宫博物院，武英殿设文物陈列所。此外前门城楼也改作国货陈列所。以中山公园为例，由于门票价格低廉（20 文制钱，另又称 5 角），夏季时每天约有 4000 至 5000 人前往游览，而逢节日或有重大活动时免费开放，则常有 1 万多人汇集于公园 60 英亩的土地上。[65]这里还承担了一定的社交作用，“在那里，你可以见到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66]。至此，皇城区域从功能上完全转型为文教、园林和展示的场所。

---

[63] 关于皇城的阻隔作用，参见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第 72 页。

[64] 可参考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论》，收入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第 37-83 页。

[65] 转引自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 153 页。

[66] 郑振铎，《北平》。收入姜德明编《北京平》，三联书店，1992：第 26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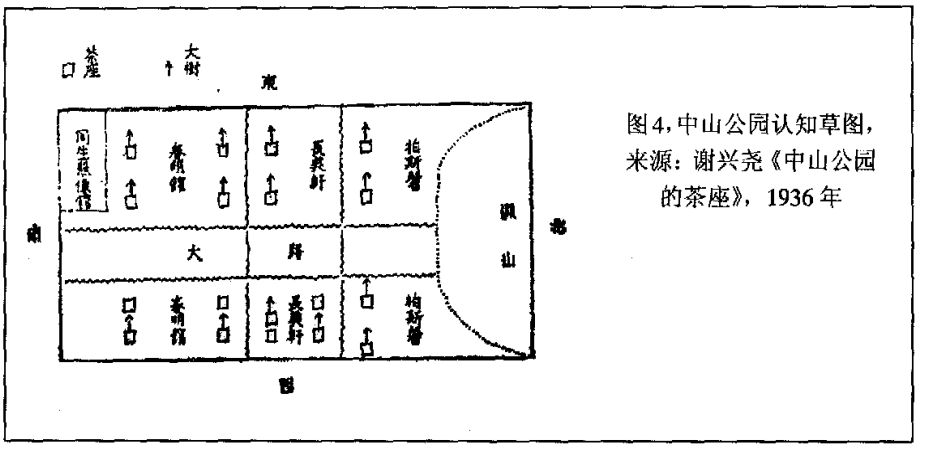

图4，中山公园认知草图，来源：谢兴尧《中山公园的茶座》，1936年

另一处由皇家苑囿改建的公园是北海。北海以其白塔、湖面闻名，尤其是它不像中山公园那样游客成分复杂，而主要为知识分子，因此得到他们的衷爱，出现频次高达26次。陈学昭将北海的“寂寞”和个人的“寂寞”并列[67]，而在另一些青年知识分子那里，北海则成为游乐园。1932年出版的一本个人诗集里记载了时尚人士北海冶游、竞赛的精彩场面，择其二如下，也可见北海繁华于一斑：

“回头一霎电灯明，何处飞来不夜城。全海顿呈新气象，解人无数笨呆情。”
“水清灯影接天光，发令原来有定章。今日冠军详核实，第一当选密司杨。”[68]

知识分子的群体生活的对于北京（北平）城市区域形象的塑造也功不可没。旧京时代，外省来京应考的文人多居住在宣武门以南，因为这里既是由卢沟桥-广安门进入北京的必经之地，又是各省旅京同乡会馆所在之处。以宣武门内外区域为主，形成了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住宅区，约从乾隆时期开始就有“宣南士乡”[69]的美誉。繁荣长达两百多年后，民国时代开始凋敝。这一方面由于清政府于1905年废止科举考试，另一方面则因为民国后打破了内外城居民民族限制，汉族知识分子普遍迁入内城居住。“内城旗民社会衰败，内、外城的界限被打破，大量文化、教育设施转入内城，知识阶层出现向内城迁移的趋势，宣南士人社会随之衰弱。这一过程大约发生于新政至北洋政府结束之时。”[70]

民国之后，由于政治因素导致北京城市结构的根本变化，这使宣南社会赖以存在的士大夫阶层发生根本动摇，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转向内城，外地知识分子很少再选择宣南作为踏入北京的落脚点，宣南地区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以

[67] 陈学昭，《北海浴日》。收入姜德明编《北京乎》，三联书店，1992：第147页。
[68] 时敏女士（沈时敏），《北海闲詠》。北平震东图书馆，民国二十一年。
[69] 吴建雍、赫晓琳：《宣南士乡》。北京出版社，2000。
[70] 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第529页。

至于在今天，天桥和大栅栏成为人们头脑中宣南历史景观的象征。”这是北平区域功能退化、转移的一个典型。

与宣南不同，天桥商业区则经历了从草创到繁荣的崛起过程。天桥位于正阳门大街南部，珠市口以南，先农坛东北，天坛西北，帝国时代皇帝赴天坛祭天必经此地。民国初年，香厂集市临时迁至此地，后来逐渐吸引了更多商贩及卖艺者聚集，并且由定期的集市转为固定的商业娱乐区。民国初年的天桥，“地势低洼，每夏，积水成渠。入夜，则蛙鸣不已，蚊蚋麕集。明沟秽水，臭气薰蒸”[71]，到三十年代已经成为五方杂处、商贸繁盛的平民商业区，北平有轨电车总站设立于此，显示该区域已经相当成熟。关于天桥在北平城市生活中的位置，文学作品也多有记载。

袁若霞在《天桥》中描绘了那里的城市景观和市民生活，“天桥是下层阶级群众的乐园，工作完毕的时候，上这儿来逛逛，买点便宜货物，吃点便宜东西，喝点便宜开水，或是在天桥的四围兜几个圈子，站在人群拥挤的地方看一下子，半天时间是极容易打发过去的。”[72]天桥的繁华与王府井大街、西单商场的繁华并非一个类型，“下层阶级乐园”的概念普遍出现在对它的描述中。

姚克在《天桥风景线》中也有同样的看法，“由此向东南循着路走去，就是高等华人所不去的“天桥”——北平下层阶级的乐园。”[73]郑振铎则在《北平》中称天桥为南城的娱乐场所的中心，“这个地方倒是平民的聚集之所；一切民间的玩意儿，一切廉价的旧货物，这里都有。”[74]

因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的差别而导致的对于城市空间的认知的差异，这一一点也曾经被拿来对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进行批判。三十年代的北平居民对于天桥的感知也存在这样的差异。“少爷小姐们，这儿不大发现他们的足迹。他们怕灰土的污染，怕臭气难闻，怕嘈杂的侵扰，他们是不愿看这些贱民，这些低级的艺术，这些缺少甜蜜味的剧本的。”[75]

在同一份材料中，还透露出城市居民对于区域感知的模糊性、混杂性。“天桥，是复杂的，多角的，集体而又纷纭的风景线，你从它的每块地方每个角落，都可以清晰的认识它，它会使你茫然失措，如读一部材料丰富的人生史、社会史，使你觉到琳琅满目而又美不胜收，不知从哪里读起，拿笔不知从哪里写起，用摄影机也不知从哪里取景呢。”由规整而混杂、由清晰而模糊，内部结构趋于复杂，北平开始慢慢具有的现代城市空间特征。

从清末的小规模临时集市发展成为繁荣兴旺、富有地方特色的商业区，天

---

[71] 张江裁，《北平天桥志》。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1936：第9页。
[72] 袁若霞，《天桥》。收入梁雨健编《故都北平社会相》，第83页。
[73] 姚克，《天桥风景线》。收入姜德明编《北京乎》，三联书店，1992：第353页。
[74] 郑振铎，《北平》。收入姜德明编《北京乎》，第269页。
[75] 袁若霞，《天桥》。收入梁雨健编《故都北平社会相》，第85页。

桥是北京（北平）城市区域进化的代表。1935年由国立北平研究院编纂出版《北平天桥志》。为一个兴起仅数十年的商业区专门立志，即使在今天也不多见。由此更可见天桥在当时的被关注程度。

3.2．4节点

北平城市空间节点非前门莫属。关于北平的散文中，高大巍峨的正阳门城楼是最经常出现的城市景观之一。前门除了是内外城道路交通枢纽之外，集中了京奉、平汉两个火车站，同时还有1、2两路有轨电车通过，并分别开往西直门和北新桥。由火车、人力车、有轨电车组成的城市交通网络，可以将人流送到北平的任何地方，前门自然成为了人流汹涌的城市节点。

上文已经提及正阳门改建工程是因为不能满足交通需要，这也反过来证明了通过正阳门的人数之多、频率之高。因为京奉、平汉两站都在前门外，旅客在此下车后，再经由汽车或人力车送往城内各处，这在当时是最常见的景观。1933年英国剧作家肖伯纳访问北平，从京奉车站下车后，便是乘一辆“绿色的自用‘824’汽车，在古城的门洞里消失了。”[76]

另一处对正阳门前交通情况的描述记录了各色交通工具并存的景象。“你向南走，直走到前门大街的边沿上，可望见……你下车来的东车站或西车站，还可以望见屹立在前面的很弘伟的一座大牌楼。乱纷纷的人和车，马和货物：有最新式的汽车，也有最古老的大车，简直是最大的一个运输物的展览会。”[77]三十年代的北平是兼具新内容和旧形态的都市，前门则是这个古城的关节和枢纽。

广义来说，北平各城门及其关厢，都可以称作节点。正如上文已经提及的城墙对于城市、乡村空间的隔离作用，城门则是沟通两种空间的枢纽所在，因此也符合节点的含义。不过，由于其它城门及关厢地区和正阳门区域无论在人流量还是影响力上均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本文认为正阳门才是北平城市空间节点。

3.2．5标志物

北平继承北京的首都身份而来的宫殿、城墙和城门，是北平区别于其它地方城市的最显著的特征。以对北京城墙和城门研究而闻名的瑞典学者奥斯瓦尔德·喜仁龙（一作奥斯瓦德·西伦[78]），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建筑有如下评论，“在中国北方的普通城市中，具有建筑学价值的建筑物寥寥无几。……城中大多数建筑物都是些很不起眼的小屋，往往是以涂上红漆的木梁木作为柱作为骨架并用青砖砌成的。”[79]北平显然不在此列。

陶孟和在《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中进一步提到北平对于城市建筑的示范作

---

[76] 端木蕻良，《肖伯纳到北平》。转引自姜德明编《北京乎》，三联书店，1992：第301页。
[77] 郑振铎，《北平》。收入姜德明编《北京乎》，第262页。
[78] 参见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收入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09页。
[79] 奥斯伍尔德·喜仁龙著，许永全译：《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5年1版，P4-P5。

用，“故从历史上观之，北平当然为中国之第一城市。伟大宏丽之宫殿寺宇，固无论矣；即平常之住宅，亦较多而精美。昔日之建筑，至今虽因时代迁移，多有渐就颓废者，然一般言之，北平居民之房屋，固优于任何都市者也。华北乡村住宅，类皆为泥土所作，体裁矮小而结构粗糙，至北平城内之房，则普通常为砖墙瓦顶，内有广阔之庭院。”[80]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在理念上有相似之处，形态上则大多以首都为范本。不同的是，只有在首都，才有皇家的宫殿，以及更为高大的城墙、城门和钟鼓楼。这些高大雄伟的官方建筑，自然鹤立鸡群而成为居民对城市认知的基本要素和定位的参照系统。

前文已经提及正阳门在交通通道、城市节点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同样也是北平的基本标志物。正阳门被称为“国之南门”[81]，又毗邻京奉、平汉火车站，因此很多外地人来到北平，正阳门是他们所亲历北京或北平的最初的地点，印象自然深刻。“一片绿色中远见砖砌的城墙隐现，而黄瓦红墙的城楼并耸在绿叶的波涛中，我能辨别这是正阳门，这是紫禁城与别的一切。”[82]

这种作用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在数十年后仍然清晰地留在人的回忆中。“前门，几百年来，曾是北京的象征。尤其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在前门建了火车站，只要下了火车，抬头第一眼望见的就是前门楼子，前门更成了北京的一张最赫然醒目的名片。”[83]正阳门作为内城城垣的第一道城门，直通紫禁城，其高大雄壮的建筑风格象征了专制皇权的威严，帝国已经瓦解，象征效果却依然存在。

另外一个有趣的角度也可以看出正阳门在对北平的城市想象中的作用。从民国初年开始，某卷烟厂开始生产名为“大前门”牌的香烟，经过 1914 年改建后的正阳门敌楼谯楼被选为香烟商标图案，成为中国烟草业史上最经典的商标之一。三十年代的人就已经能够根据“纸烟箱”上的图案辨别正阳门[84]，甚至直到现在这个图案仍然经久不衰，刘心武在《半城宫墙半城树》中还在利用“大前门”香烟盒上的正阳门图案来论证文化名城现代化建设时面临的新和旧的矛盾问题。没有确切的统计方法可以评估这种特殊的形象是怎样地影响了人们对前门、对北平的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前门对于北平意象确实是不可或缺的。

在正阳门之外，景山因其高度成为北平的另一个地标。或许可以说故宫的午门、北海的白塔、地安门外的钟鼓楼，都可以作为地标。实际上也确实有不少人登午门（如郑振铎）和北海白塔（如吴伯箫）来欣赏北平城市景观，但是没有哪个能够替代景山的作用。

---

[80] 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社会调查所、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1920 年）：第 60 页。
[81] 参见铢庵，《北游錄话》之一。《宇宙风》，第 19 期。
[82] 孙福熙，《北京乎》。收入姜德明编《北京乎》，三联书店，1992：第 155 页。
[83] 肖复兴，《前门外》。收入邹仲之编《抚摸北京》，三联书店，2005：第 68 页。
[84] 参见铢庵，《北游錄话》之一。《宇宙风》，第 19 期。

景山本为紫禁城筒子河的淤泥所堆积而成，又被按照规划置于紫禁城之北，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拥有绝对的制高点。登景山俯瞰北平城市景色，是很多人的自然选择。许地山在《上景山》[85]一文中详细记录了他登临景山，依次观览故宫、东西城天空中的鸽群、景山万春亭、钟鼓楼、地安门大街的经过，即景叙史、抒情。

郑振铎在《北平》中提到，“你如果站在（景山）最高处，向南望去，宫城全部，俱可收在眼底。而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无线电台，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三条胡同的协和医院都因怪不调和而被你所注意。而其余的千家万户则全部隐藏在万绿丛中，看不见一瓦片，一屋顶，仿佛全城便是一片绿色的海。”只有在景山上，才可能找到俯瞰全城的视角，这个优势是其它地点所无法取代的。

3.3 其它城市空间要素

上文按照现代城市意象要素分类，根据对资料的统计，分别论述了构成北平城市意象的主要要素。但统计表中仍然有不少带有明确的空间特征的地理概念，或者具有北平地方特色的城市景观，不能纳入到凯文·林奇的五种分类里面。这里将做一分析尝试。

其一，风和土。这两种自然地理现象在对北平城市的描述中出现频率非常高，前者 10 次，后者高达 16 次。除去部分两者同时提及的情况，两种现象出现总次数几乎占去全部样本的六分之一。

何容在《北平的风水》里提到，“初到北平来的南方朋友，总觉得北平的风可怕。住常了，也就慢慢的能适应环境了。……北平的风之所以讨厌，却是因为它给人种种压迫。”[86]风既令人深觉压抑，尘土则更甚。“一阵阵的灰砂，常会没头没脸地盖下，你如果正在路上行走，没有带上眼镜或蒙住嘴鼻的话，算不定会使你迷住了眼或抹了一鼻子灰，所以到北平旅行的人，常以此为苦。”[87]

风、土，以及北平荒凉干燥的气候，也反映在当时青年诗人们的创作之中。张洁宇的《“边城的荒野留下少年的笛声”——1930 年代北平“前线诗人”的城市记忆与文化心态》[88]中提到北平荒凉的自然景观如何强化了“故都”意象，“北平的‘风沙’已经超越了自然气候的现实层面，成为荒凉、衰落、冷漠、隔膜，甚至精神压抑的象征。”这是将地理现象与文学意象紧密结合的分析，与绪论中提及的其他先例思路极为类同。

另一方面，从对城市感知来说，“无风三尺土，微雨满街泥”（又作“无

---

[85] 许地山，《上景山》。收入姜德明编《北京乎》，三联书店，1992：第 540 页。
[86] 何容，《北平的风水》。收入陶亢德编《北平一顾》，上海，宇宙风社出版，1938：第 73 页。
[87] 朝英，《北平的气候》。收入陶亢德编《北平一顾》，1938：第 65 页。
[88] 收入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

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非常确切地形容了北平多风沙的自然特征，因此在当时人的散文中出现次数很多，包括朝英、梁实秋、钱歌川等近十人都在文章中有提及，它是描述北平城市景观不能绕过的要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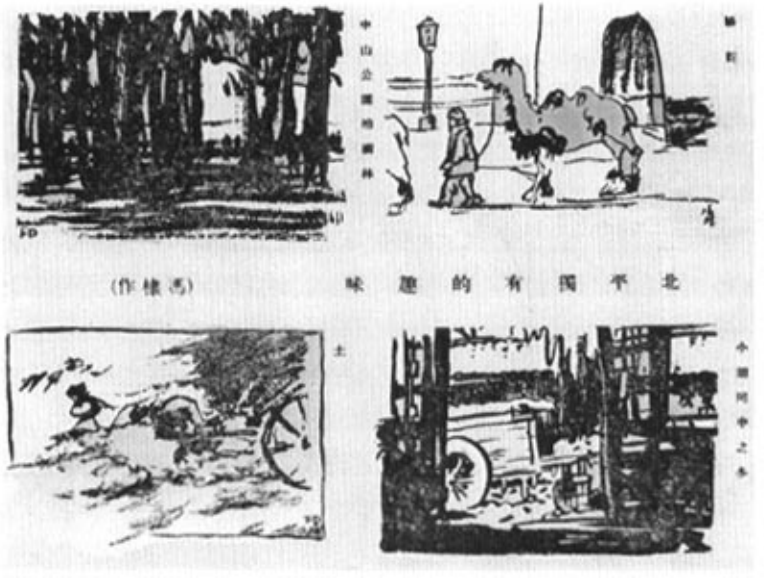

图 5，北平城市景观
来源：《宇宙风》，第 19 期，1936 年

其二，声音意象。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使用了一个新的“声音意象”的概念，用来指称北京话的话音和北京的叫卖声等所营造的“老北京的声音记忆”[89]。北京话的“京腔”和叫卖声都是北京（北平）人日常生活声音环境的一部分，当然，还有包括鸽哨、钟鼓声和守夜人的更声等其他种类。

“乡音未改鬓毛摧”，语音从来都是建立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的重要渠道，北京话不仅是本地居民之间的日常语言，甚至起到了对外地人的文化同化作用。台湾女作家林海音说话带有浓厚的北平音，因此被人称为“比北平人还北平”[90]，她的文学创作也多以成长生活所在的北平为空间背景。

在外地人看来，北京（北平）话也不仅仅是一种地方语言。民国时期关于“国语”选择北平话还是南京话作为范本曾经有过一场争论，北平话最终胜出。以北京（北平）话为基础的“国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成为和北平城市并行的声音形象。“它（北平）属于人人，好比它大方的语言，是全中国的。所以我们

[89] 参见赵园，《北京：城与人》。第 132 页。
[90] 林海音，《林海音自选集·小传》。转引自赵园，《北京：城与人》。第 142 页。

不能没有它，它是中国和平的征象。”[91]

北平的叫卖声讲究韵味、音乐性，多见婉转曲折的“炫技”，“坐在屋里，听到各种不同的音调，叫卖着什物，有的悠扬宛转，有的哀婉凄恻，有的高亢壮烈，使你心神要跟着它走，感出时序的流转，发出人性的流露，喜怒哀罹，任它来领导”。叫卖声丰富了、深化了对北平的感知，高超的叫卖技巧不仅能吸引顾客，又颇具艺术性，“卖什物的，用着美妙的调子，唱着所卖的什么，音调和什物之间，有一种和谐存在着。”[92]

赵园注意到“京腔”和叫卖声都有对声音过于注重，甚至削弱了“达义”作用的情况，而近似于艺术发展中趋向工细的倾向。其实，北平城市的声音早在三十年代便已经走入了古典音乐中。1933 年，上海的白俄音乐家阿甫夏洛穆夫作曲，并亲自指挥百代唱片公司交响乐队演出反映“故都”北平市井生活的交响诗《北平胡同》，并灌制成唱片[93]。这事在徐訏的散文《北平的风度》中可以得到验证：“凡未去过北平，而在大光明戏院看影戏，去年的音乐会里听到《北平胡同曲》的，想都要憧憬北平胡同的美妙了。”[94]时隔半个多世纪，曲目可能早已难以寻觅，但它的存在足以证明声音是对北平城市感知的重要而又有趣的部分。

---

[91] 李健吾，《北平》。收入陶亢德编《北平一顾》， 1938：第 666 页。
[92] 吕方邑，《北平的货声》。收入陶亢德编《北平一顾》， 1938：第 107 页。
[93] 参见《上海百年文化史》，第二卷（上）。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第 771 页。
[94] 徐訏，《北平的风度》。收入姜德明编《北京乎》，三联书店，1992：第 385 页。

第二章　城市实体空间与城市意象

1. 北平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

1.1 民初到北平时代的城市管理

史明正曾在其对于北京城市近代化的论著中，以1914年前门瓮城改造时千步廊附近小摊主的抗议来说明“北京的空间变化确确实实地影响了人民生活。对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打乱了传统的谋生方式。”[95]实际上，城市建设绝非单纯只是带来的城市空间变化或是影响摊贩们的利益，城市管理体系的革新隐藏在景观变化现象之背后，最终，显的景观和隐的管理方式都影响到人对于北平的城市感知。

北京（北平）城市管理的近代化始于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为维持地方社会秩序，他们参考在租界实行的办法，组织巡捕居和安民公所。它们除了负责维持治安的基本职能外，还负责维持经济秩序、卫生环境及道路工程的督管工作。实际上，这是北京近代市政管理机构京都市政公所的雏形。

1901年清政府对原先管理京师地方的步军统领衙门进行改造，设置两处警务处和十处警务公所，后者基本继承了安民公所的辖区范围。同年，改称善后协巡总局。1905年改设内外城工巡总局，同年再次改称内外城巡警总厅，下设总务、行政、司法、卫生和消防处，直属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内务部。至此，北京正式建立起综合性的近代管理制度[96]。

1914年在内务总长朱启钤的提议下，袁世凯同意设立京都市政公所。京都市政公所负责管理北京地方市政建设，虽然仍然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设立的，毕竟改变了以往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北京地方建设的传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京都市政公所是北京政府时代城市建设管理者和执行者，是后来的北京（北平）市政府的前身。

1921年，北京政府颁布《市自治制》，首次把全国城市以法规形式确定为特别市和普通市两种，作为首都，北京地方设立京都特别市。1924年，四郊工巡捐局划归市政公所管辖，郊区人口纳入北京人口统计，郊区和市区关系更为紧密。这个城市管理体系一直维持到1928年民国首都南迁，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

从民国八年（1919年）出版的《京都市政汇览》[97]来看，京都市政公所下辖工巡捐局、测绘专科、京都市仁民医院、京师传染病医院、京都市营造局、城南公园事务所、海王村公园事务所、京都市工商业改进会事务所、材料厂和工程队，

---

[95] 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第90页。
[96] 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第31页。
[97] 京都市政公所编，《京都市政汇览》。京华印书局，民国八年。

从测绘到施工到管理几乎全部涵盖在内。交通事业方面，市政公所的工作包括“整理正阳门”、“增辟皇城各门”、“开辟西城南北新华街及城洞”、“使馆界道路补助费”等四项。其中第三项开辟南北新华街及城洞的条文，详细说明了开辟道路、城洞的目的，提议过程，北新华街修筑情况，南新华街修筑预算等项目，“将来全工告竣，实内外城交通上之一大便利也”。这为最终开辟和平门打通南北新华街做了充分的准备。

京都市政公所负责的工程带有浓烈的近代化色彩。从拆除、改建前门瓮城开始，京都市政公所不断拆除疏通城内交通、改建或开辟新公园、设立医院、设立陈列所等等。京都市政公所在尽力保持既有的风貌的前提下，对北京城内大量的帝国时代的遗物以现代化的方式进行改造，而没有一味地追求现代城市景观，它的理念即使现在看来也颇为先进；有似于“整旧如旧”，但又不完全是作为旅游景观而是同时承担了现代建筑的某些功能。它的努力有时显得非常不易，比如由于缺乏经费，以出售城砖的方式弥补捐税所不足的拆除皇城根的费用。在它的努力和影响下，北京虽然有些跟不上南方城市的现代化步伐却也繁盛一时。

1928 年民国迁都南京，北京改名“北平”，次年设立北平特别市，直辖于行政院[98]。北平市政府下辖社会局、公共安全局、财政局、公用局（工务局）和卫生局等。从组织体系来看更为细化，职能明确。

以 1933 年北平市工务局呈报市长的文件为例，所引用市长的训令中明确提到“拟即自二十三年一月起至二十五年底止，以此三年，为本市市政建设计划初期，在此三年中，凡社会、公安、教育、财政、土地、工程、卫生，以及各项公用事业，何者应予改革，何者应为创办，何者应加以扩充整理，审实际能力之所及，定最低限度之要求，并为斟酌轻重缓急，分期逐步实施完成。”[99]该训令还要求各局在半个月的时间内上报具体的建设计划。由此可见，三十年代的北平政府将市政建设状况仍旧定位在初期，并极力督促办理。

1.2 北平 1928-1937 年期间的城市建设

1.2.1 现代道路体系的构建

尽管对于三十年代北平市时期城市建设的专门研究付之阙如，但是不能否认这段时期在此前基础上的后续之功。北平俗谚“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清代北京城内道路，除去宫殿、府第里以及少数重要的道路，如正阳门内外，铺以石板之外，都是裸露的泥地，浮土非常严重，一下雨自然就泥泞满地。民国之后，市政机构开始大规模整理道路系统，颇有成效。“至 1929 年为止，北京城的全部重要街道皆已被改变成碎石路和柏油路，许多街道得到了加宽和拓

[98] 北平也曾短时间降格为省辖市，辖于河北省。
[99] 北京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J1，目录号 4，卷 51，第 4-5 页。

展。”[100]市政工程到三十年代已经进展到翻修、补修城内道路和修筑城外近郊道路，它们奠定了北平城市景观的基础。

进入三十年代，北京城市建设仍以改善交通道路为主。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下半年北平市政建设包括修筑道理、整治上下水道等内容[101]。内容包括以下十二项：展修及补修沥青路十三段计 35063.80 平方公尺；展修翻修及补修石渣路三十段计 110452.65 平方公尺；铺墁缸砖路三处计 3570.38 平方公尺；添墁及揭修石板道九处计 2416.57 平方公尺；铺墁缸砖及洋灰砖步道五处计 2588.78 平方公尺；人工修筑土路十四段计 58798.00 平方公尺；筑路机修筑土路一百四十段 323899.70 平方公尺；接修暗沟及过街沟十七处计长 954.71 公尺；接修缸管支沟三十九处计长 600.67 公尺；掏挖明沟暗沟共五十六段计长 19427.2 公尺；挑挖河道三段计长 2722 公尺；运除积存秽土三处共计 35057.4 中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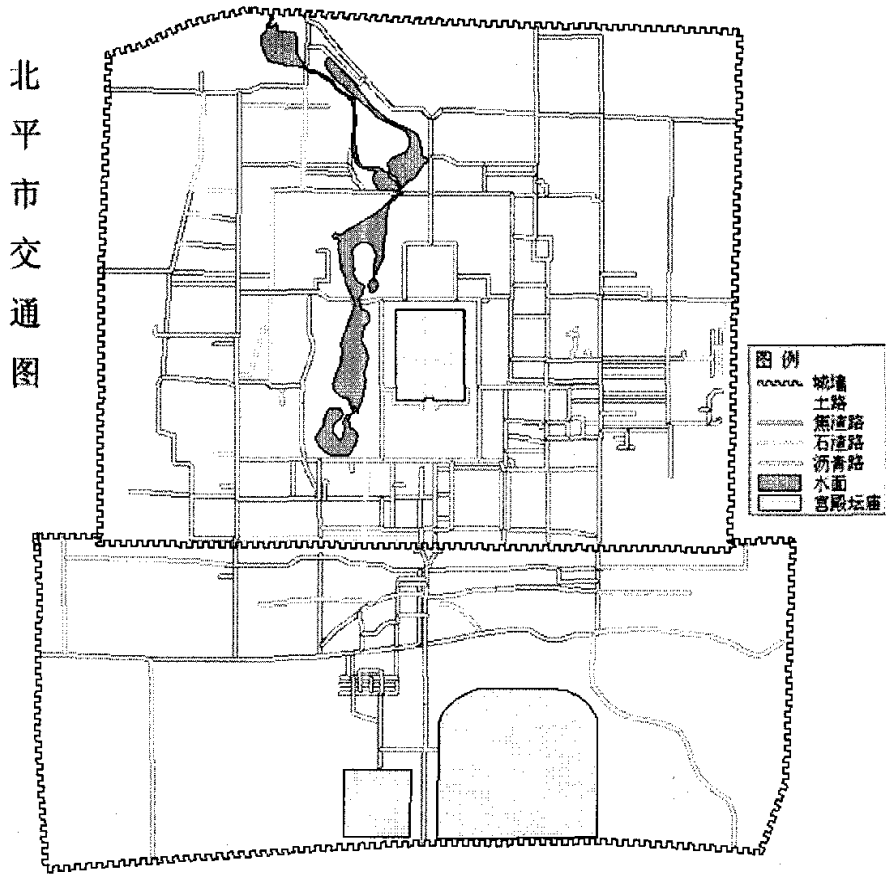

图 6，北平市交通图
来源：北平市统计览要，1936 年

[100] 同上。第 96 页。
[101] 同上。第 9-10 页。

从拟定的1934年到1936年的三年柏油路修筑计划中[102]，也可以看到北平市致力于市政建设的雄心。其中第一年计划修筑13条道路，共计31053平方公尺，第二年为14条41313平方公尺，第三年为19条35814平方公尺。到1936年时，除了北京政府时代所修筑的道路之外，新修或补修道路已经基本覆盖了北平城区，甚至开通了郊县方向的长途汽车[103]，这也证明了当时北平的城市交通水准。

与道路建设相关的还有一项活动值得注意，运除秽土。由于漕运在清末逐渐停歇，原先北京城市水道年久失修，城内不少地方改作暗沟或者填成道路，如使馆区内的御河。从废弃河道中挖出的淤泥，以及生活垃圾，构成了街头秽土的主要部分[104]。到三十年代，积存秽土已经有约三十万方，十分惊人。为此，北平市工务局向市长提交了《“运除积存秽土”计划》[105]，其中提到将用三年分阶段运除，并且提出用秽土填埋洼地、化无用为有用的建议。

除了城内外的道路修建外，北京对外联系也逐步近代化。首先，1896年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贯通，随后1900年由英国出面将车站由城外宛平续建至正阳门外东侧。到了1905年卢汉铁路（平汉铁路）全线建成时，车站就设立在正阳门外西侧。1909年京张铁路建成，车站设立在西直门外，这条铁路也称为平绥铁路。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从北京到上海的铁路线连通。此外，还有些短途的铁路，如到门头沟、梁各庄铁路陆续建成。最终，1916年初北京环城铁路建成，连接了京张、京奉、平汉各铁路站点。通过这条环线，即使来自上海、南京、武汉、东北、西北等不同的地方，旅客都可以很便利地到达城市节点所在——前门。

1.2.2“以合于艺术化的设计改善市街房屋建筑”

保留原有的风貌或建设新型的城市，是任何一个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城市都要面临的矛盾，北平也不例外。实际上，市政建设绝对不止是官方的问题，市民对于市政建设的得失也有自己的判断。铢庵在《北游錄话》中提到：

> “中国古物之所以不容易保存，就是因为没有整理的原故。整理得法，是有益于古物保存的。试看朱氏（指朱启钤）修正阳门楼一带地方，虽然略略改变了原状，但是出处都能因势利导。其所用之原料，所采之风格，都不

[102] 同上。第18-29页。

[103] 截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平长途汽车线路共8条，分别为安定路（安定路-小关-小六工坟-立水桥）、朝阳路（朝阳门-红庙-大黄庄）、永定路（永定门-大红门）、青阜南路（阜成门-白堆子-八里庄-田村-小黄村）、磨石口路（小黄村-磨石口-三家店）、青阜北路（小黄村-门头村-青龙桥）、温泉路（青龙桥-西北旺-温泉村）、西直路（西直门-海淀-青龙桥）。

[104] 参见《1930年北京垃圾的构成》。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第111页。

[105] 北京档案馆档案，全宗号J1，目录号4，卷51，第55-56页，第145-146页。

失其旧，绝无任意攙杂之弊。至于袁氏（指袁良，北平市长）所修牌楼，以钢筋混凝土照原式作成，夜市根据专家设计，并非出之孟浪。而其改宽之街道，也以恢复旧观为主，不能不说都是北平的工程。也是一班人的公论。”[106]

民众对于市政建设的品评，证实了城市建设、城市景观变化对于城市感知的影响。

北京在建筑上引进西方样式的历史悠久，到清末出现了一大批西洋风格的建筑[107]，包括宗教建筑、各国公使馆、洋行、银行、医院和饭店等。以教堂为例，天主教北堂（西什库）、南堂（宣武门内）、东堂（王府井大街）、西堂（西直门内）原本初具规模，“义和团”运动毁弃之后重修，更为宏伟壮丽。此外还有位于内城东北角的俄国东正教堂，也是西洋风格。中国建筑中，圆明园已遭焚毁，而西直门外的三贝子花园（万牲园）门楼，带有强烈的装饰主义风格，至今仍为北京动物园正门。

另一方面，北平传统的四合院是北平特色的住房式样，很多时候四合院，以及院中的“天棚鱼缸石榴树”，被当作理想的住房模式。对此，已有足够多的研究，此不赘述[108]。宫殿、四合院、寺庙，等中国传统建筑，既提供了居住空间，又孕育了北平特色的空间感知。只是，这一点在受到西方建筑风格的冲击和混杂。

本节标题提到的是一份颇为特别的文件，是北平市工务局呈报市长的“以合于艺术化的设计改善市街房屋建筑”报告[109]。这份报告透露了三十年代北平市官方对于城市里传统风格和新式建筑之间矛盾的看法。报告指出：“商铺市房除少数经营不振商家仍保持旧式建筑外，其余悉改建成中西式揉杂之建筑。即其中完全采用西式者，亦大率东鳞西爪，故恒见希腊式之柱头。或配以罗马式之檐口，驳杂不伦，最为全市之玷。”[110]这揭示了一个事实：西方的样式已经在北平比较普遍，并且和北平原有的协调景观不一致。既然不能固守原有的传统城市形态，只能求助于融合近代城市理念。但对此市政当局也认为颇难操作：“建筑规则所能纠正者仅属工程方面，美观与否，恒难定一具体标准以资取缔。”

在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了计划参考上海市对于城市规划的经验。上海市于1929 年开始实施“大上海计划”是在租界和老城区之外，在黄浦江靠近河口的五角场区域建设新中心城区的雄心勃勃的市政计划，它想必也带给北平的市政管理者很深的印象。受其启发，北平市对于城市分区规划思路渐渐清晰。报告中提

106 铢庵，《北游錄话》之一。《宇宙风》，第 19 期。
107 参见张复合，《北京近代建筑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08 赵园也认为对于四合院的文化阐释已经无法突破，除非引入新的理论工具。参见《北京：城与人》，第 94 页。
109 北京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J1，目录号 4，卷 51，第 127-132 页。
110 北京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J1，目录号 4，卷 51，第 128 页。

到："外城当以外四区外五区之一部为居住区，外三区偏处外城东南，本市冬季多西北风，工厂烟灰不至影响城内，实为一理想之工业区。"[111]尽管这一设想直到今天从未变成过现实，但无疑显示了三十年代对于北平城市空间规划的思想已具有了现代城市规划理念。

目前，尚没有细致的研究来验证北平市的那些市政建设计划究竟实现了多少，至少可以确知的是，三十年代的北平市政府一如既往地进行着近代化城市建设，塑造着城市的实体景观。

2. 城市意象同城市实体的叠加与错位

2.1 叠加关系

历史学者董玥用"再生"（Recycle）作为关键词之一来定义民国时期北京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12]。当然，这不是仅仅从赫达·莫里森的照片中得到的灵感[113]，而是指北京（北平）通过对于传统的循环、再生、回收，以变换的形式实现了在向近代都市进化过程中传统的连续性。是这种务实的、主动的转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不是革命性地彻底推翻。尽管"五四"运动是北京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一笔，但"五四"后的知识界的消沉、彷徨和回归更有力地证明了其不可避免的弊端。"再生"的北平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造就了后来令人怀念的"黄金十年"，直到战争最终以非常的方式打破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

对于北平城内常见的皇家宫殿、园林的使用，就是"再生"的最佳例证。以公园论，中山公园原为社稷坛，城南公园原为先农坛，北海公园、中南海原为"三海"，它们都是从宫禁之所变为向市民开放的公共空间。紫禁城改为故宫博物院，前门城楼改为国货陈列所，三贝子花园（清末曾为农事试验场）改为万牲园（动物园），在王府内设立天主教辅仁大学，等等。

北平所继承的帝京道路，也在知识分子的认知过程中重新参与了一种"北平"形象的建构，"故都的道路广而直，建筑雄壮，空气又清，很远的景物一望可见，形成伟大的气魄；站在丁字路的菜市口，也可以这样感觉到。"[114]数十年后，仍然有人注意到这个显著的现象，"初到北京的人很容易注意到北京这横平竖直的、气派非凡的、宽阔舒朗的皇家大道，并且很容易在这接到风格与北京人的性格、北京人的道德观念、北京人的文化产品之间建立起类比关系。他们往往

---

[111] 同上。第 130 页。

[112] Madel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U.C. Berkeley Press, 2003：第 17 页. "Recycling, with its concomitant soci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such as nostalgia, is a key quality of Chinese modernity."

[113] 赫达·莫里森拍摄过一张北平街头拾纸人的照片，见 Hedda Morrison: *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

[114] 钦文，《菜市口》。收入姜德明编《北京乎》，三联书店，1992：第 477 页。

不自觉地成为专制之美的拥护者，并且能够感受到创造历史的冲动。”[115]北平的城市景观有非常大的部分都是帝京时代遗产的变形，旧的形态被赋予新的用途，这种对于建筑和空间的使用方式影响到对于城市的感知。

但是对于这种现象，知识分子的感受并不相同。董玥将生活在北平、受过“五四”影响的知识分子统称为“新知识分子”，与之对应的则是帝京时代遗留下来的本地化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生活在北平，通常是“因为任职或就读于那些在京新设的教育机构，于是，他们与北京的关系就非常不同于那些帝京学者。”[116]新旧知识分子与北平的关系亲密远近不同，对它的“再生”现象看法自然相差甚远。当老一批知识分子叹息北京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从此将萧条衰亡时，新知识分子却津津乐道于北平的公园、茶馆、饭店，当然不用说书市、图书馆和大学了。这批人大多受过西洋教育，他们对于北平的近代化至少不持排斥态度，或者说持乐观的态度。尽管他们参照其他城市（多为西方城市或西洋城市在中国的投影，上海）对北平有所批判，本质上则有着对于近代化、新文化的乐观和自信。

具体说来，“新知识分子”之体验北平，与旅游者、观光客的角度颇有相似之处，董玥称之为“重合”（overlap）[117]。与最常被知识分子提及的空间要素类似，“当时在《旅行杂志》上刊载的旅游栏目《北平七日游》推荐旅游者游览的同样是天坛、先农坛、钟鼓楼、雍和宫、孔庙、国子监、颐和园和西山景点、故宫博物院、中央公园、长城、景山、天文台、汤山以及万牲园。”[118]这种显著的重合，反映出北平城市意象乃是严密地叠加在城市实体上的，而这些实体又多为帝京北京的遗产。

有个事实值得注意：表面看来这些空间要素几乎都是在原有的宫殿、苑囿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很少完全新建的。所以，当从知识分子描述中找到的近现代要素远远低于历史遗产时，不能否认的是尽管这些要素形态、名称未变，其基本功能可能完全是西方化、城市化的，比如公园，比如博物馆，比如图书馆，这些功能在传统中国城市中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理解上述城市意象要素统计中对于近现代因素的遮蔽或“盲点”非常重要。

与具有类似的“文化养成”经历的新知识分子之间的重合不同，本地人（natives）和“访问者”（visitors）之间经验、目的，还是观点和对环境的态度，均少有类同[119]。这并不令人奇怪，或者准确地说，“新知识分子”正是北

---

[115] 西川，《想象我居住的城市》。收入邹仲之编《抚摸北京》，三联书店，2005：第 36 页。

[116] 董玥，《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收入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第 239 页。

[117] Madel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第 271 页。

[118] 董玥，《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收入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第 243 页。

[119] Yi-fu Tuan, *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第 246 页。

平的游客者、访问者的主力，旅游杂志的编辑也不外乎出自“新知识分子”的圈子范围，其文化养成大体上相似。而真正的北平本地人，对北平的感知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和知识分子的感知渠道大相径庭。

当本文根据 130 篇散文得出的北平城市意象要素，只能说是相对忠实地反映了它们的作者——主要是新知识分子——对于北平城市空间的感知时，其实隐藏了样本提供者本身的身份、背景的差异。他们在这个体验、描述、出版、传播、再现的流程中所出现的不同取向，其区别在于新旧两类知识分子同北平城市的情感、精神上的联系，或者说是二者对于同一个物质实体——北平城市空间——的感知受到其心理因素的投影。

不过，如果本文关注的仅仅是知识分子建构北平城市空间构成所依赖的具体要素，则没有太大不同。不管是“新知识分子”与本地知识分子或居民，又或者中国人和外国人之别，基于既有的城市实体上形成的对于城市的感知，是一种常见的人文地理学现象。或者可以说，北平城市意象以不同层次叠加在同一个北平城市实体上这一模式，其实是相通的。

2.2 城市意象同城市实体空间的错位

如果城市意象叠加于城市实体空间之上，并且二者能够完全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吻合关系，那么关于城市意象的讨论就简单多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城市意象不只是实体空间的次生产物，它在生产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放大、忽略、变形等等情况。

比如，什刹海（又作十刹海）位于积水潭东南，鼓楼西南，南邻北海，是高粱河经由德胜门水关进入北京后城市水道的一部分[120]。在民国时期新知识分子关于什刹海的描写中，多反映出该地水草丰美、稻田万顷，一派江南景象。比如，1936 年铢庵在《北游錄话》中提到“循着这墙，一直往西，在路的右边，一道长堤，两行垂柳，堤下便是方卦似的稻田，夹着绿水红荷，俨然江乡风物。”[121]

从地理空间来看，什刹海位于内城城墙范围以内，离皇城后门地安门咫尺之遥，因此它又被当作北京（北平）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证明，而为知识分子所称道。不过，有意思的是市政档案显示这只不过是当时缺乏管理、放任滋生的一个结果。

1935 年北平市政府在编制北平导游概况时，对于什刹海的现状和成因说明如下：“十刹海积水潭在昔日中山北海等公园未开放之先，为本市惟一公开游览之公园，尤以夏日荷花盛开时游人多集此，赋诗讌会，近十年来因中山北海等公园已开放，中上级社会人士已不复前往，兼以管理乏人，夏日浮摊林立，已成为

[120] 参见侯仁之，《晚晴集》。新世界出版社，2001 年。
[121] 铢庵，《北游錄话》之六。《宇宙风》，1936 年，第 24 期。

一临时商场，海水又复日益淤浅，荷花已多改种苇子及稻田，风景已大不如昔日之优秀。”[122]报告对于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江南佳致”、“乡村风光”并无半点兴趣，而忧心忡忡于不复往日之盛况，因此决意整治河道，取消苇地稻田，仍就种荷花，修治道路，改成正式公园，以益西北城居民。

何以在知识分子描述中作为同城市景观的日益近代化相应相和的乡村景致，竟然实际上并非有意为之，而在市政当局只是财力不逮的后果，并且要继续发展成为典型的城市空间——公园？这恐怕不能不归结为知识分子对于该地的情感投射。北平新知识分子大多来自南方的，很容易将有水乡风情的什刹海作为故乡的缩影。即便是本地知识分子如老舍，也对这样的城市和乡村景致的和谐心驰神往，“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123]。老向笔下的北平，“一出城门便是乡村；便有田园”[124]，这不能不说是植根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和谐期望的某种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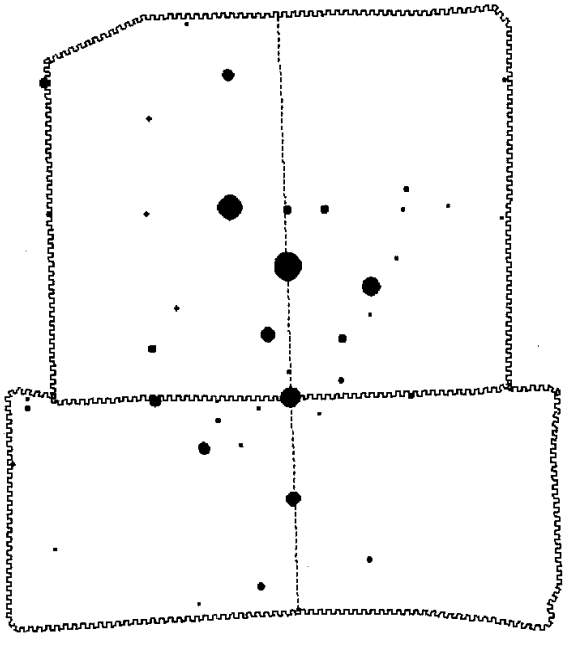

图 7，北平城市空间要素的非对称分布

如果说什刹海的例子说明了情感因素对空间认知的助力作用，对于北平城市的平面感知则说明了意象同实际的偏差。北平位于华北平原北部永定河冲积平

[122] 《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关于会编北平导游概况的训令》，第六条。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1，目录号 4，案卷号 46，1935 年 4 月。
[123] 老舍，《想北平》。收入姜德明编《北京乎》，三联书店，1992：第 411 页。
[124] 老向，《难认识的北平》。收入姜德明编《北京乎》，三联书店，1992：第 298 页。

原。不少关于北平的文学作品中，都对北平留下地势平缓的印象，并且进而更感觉的城墙高耸、城楼巍峨，有“伟大的气象”。然而这种主观印象并不可靠，如果参照北平城内的高程来看的话。根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北平特别市政府发布的高程报告[125]，通过对北平内外城 109 个点的测绘，北平城内的高程标准差已达 9 米以上。对于一个面积仅四十余平方公里的城市来说，这样的数值证明其地表绝非如预想的那样平坦。

对于北平城市空间要素分布的考察更典型地证明了通常对于北平空间结构的一些假说适用范围非常有限。北京（北平）是一座严格按照规划建设的城市，以皇城为中心大致呈对称分布，因此也给人一种城市空间要素是对称分布的假象。然而根据本文之前对于北平城市空间要素的统计，显示出一个以皇城为中心，内城密集外城分散，以中轴线为准偏重西半部的显著特征，见上图。

上文对于北平城市意象要素中区域的分析已经提到，帝京时代南方知识分子往往居住在宣南地区，进入民国之后知识分子迁入内城，除了师范大学以外其他的大学、图书馆、研究院、博物馆几乎都在内城，公园亦如此，这导致了知知识分子的生活空间基本以内城和外城的西半部分为主。而外城的东南部分，地势低洼、水面甚多，天坛占据了大片土地却又必须加以保护而不能像先农坛那样改建为公园和游乐场，再加上漕运废止之后广渠门一带水道的重要性下降，还有铁路对于最东南角的分割作用，这些原因导致了知识分子很少出现在比金鱼池更东南的地点，反之，外城东南部分也就很少出现在知识分子的描述中。进而，根据知识分子文学描写所得出的城市意象要素分布图中，自然难觅其踪影。

125 《北平市内外城水平表》。收入《北平市统计览要》，北平市政府，民国二十四年。

第三章　城市意象的生产

1.空间感知和意象表达：文学和地图

在人文地理学看来，对于地方的感知是人最常见的认知行为之一。洛温塔尔（Lowenthal）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提出“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也是因人而异，它们不是幻想，而是有着坚实的事实根据。”[126]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地理行为、人的感觉与思想的研究，并结合考虑空间与地点的问题，达到对人类世界的认识理解。”（段义孚）[127]

以城市地理学中的经典命题街道，作为公共空间的安全感问题为例[128]。同样的一条街道，却既能够提供安全的感觉，也能成为充满风险的区域。安全感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地方的主观感受，它虽然不以直接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却从内部影响着人的行为决策，比如夜间出行次数的多与少。至于人是如何感受到环境中微妙的安全因素，以及这种感受是如何进入行为决策系统，甚至成为话语表述的一部分，都是有待深入的问题。

对于地理空间的感受的表达，最方便的方式通常是文学作品或地图。妹尾达彦在《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中提到“故事的起源、转折都有长安真实存在的坊名、街道名称出现，使故事增强了现实感。”[129]朱玉麒在《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中，将妹尾达彦的研究重点归结于“地理空间观”，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学基础上的行为地理研究。对于以虚构为基本特征的小说而言，地理空间概念的真实性为小说内容提供了逼真感和可信度；而对于多直抒胸臆的散文来说，则不必兜这样的圈子，往往提到哪里便是哪里，也因此更具有可信度。

再看地图形式。地图是在二维平面表现地理空间形态的直观方式，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绘制地图的国家之一，马王堆出土的三幅地图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近代以来由于技术的停滞而落后于西方，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地图往往需要参考西方人绘制的地图。

另一方面，“地图信息的感受过程，也是地图的认知过程。地图认知在地图信息感受中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要获得更深层次的地图信息，必须充分发挥用图者对地图认知的主观能动作用。”[130]历史地图因绘制资料、绘制原因的随时

---

126 转引自 R.J.约翰斯顿著，唐晓峰等译，《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 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219 页。

127 转引自 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 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第 234 页。

128 参见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美国大都市的生与死》。译林出版社，2005 年。该书第一章对于街道安全性的研究非常著名，发展了白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以来的街道社会研究。

129 妹尾达彦，《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

130 廖克，《地图学的研究与实践》。北京，测绘出版社，2003：第 270 页。

间流失的缘故，更需要比较和解读，才能发现其中的信息。

一份刊行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的特殊地图 *The Map of Peking Folklore*[131]（老北京风俗地图，以下称“风俗图”）为我们揭开了当时人对于北京空间感知的一角。这份署名窦尔恩（Frank Dorn） 的手绘地图于数年前在首都图书馆被发现，此前从未见诸各类关于北京的地图或图书目录。不过，地图右下角注明的出版机构 Peiyang Press. Ltd. Tientsin, Peiping. 则显示此份地图应该是公开出版发行的。

这份地图（见下页）不同于通常的测绘地图，比例尺、图例都没有严格设定，因此不像西方制图技术下的地图产品，倒像插图（Illustration）式的漫画。或许作者绘制之初就没有想让他成为一份严谨的地图，而是当作游览指南和风俗画卷，那么这幅图展示的就是“作者眼中的”北平了。

显然，每个人对于城市的感知都是基于个人经验的，这份民俗地图也明白无误地显示出绘制者对于他所关心的城市要素的筛选，何者为应该注意的，何者重要性一般，何者可以直接忽略，都在于作者的判断。图中对于基本实际情况的某些错漏、偏差或扭曲的表现也是表明了绘制者的主观因素的作用，比如对于东便门火车通道的描绘，这幅图有些想当然地将环城铁路从角楼之下穿过，而事实上环城铁路是经过内城东南角时，是在城墙上新开辟了火车专用通道。

如果把这份“风俗地图”看作是一种的“认知地图”，那么同时代发行的另外一份地图，则是相当严谨的测绘地图。L.C. Arlington 所著 *In Search of Old Peking*（《寻找老北京》，以下称“寻找图”）附了一张精美的名为 *Plan of Peking* 的地图，未署名。对照这两幅地图，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内，对于同样是旅居北平的外国人来说，北平的形态也是如此不同。

首先，“风俗图”放大了官方建筑的比例。由于采取具象描绘的方式，所以对于从正阳门到钟楼的区域，以及沿中轴线上的建筑，都放大了比例。这一点在同其他内城建筑的对比中非常明显。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原先的皇家宫殿、园林区域强烈吸引着“访问者”的注意力，作者也不例外。相应的是，在“寻找图”里作者冷静地描绘了中轴线上建筑的范围。尽管后者没有刻意突出，却使得皇城在整个城市布局中的比例精巧得当地显示出来，远比“风俗图”看起来更贴近城市设计者的意旨，这也反衬出“风俗图”作者感知中城市空间距离、比例受到的扭曲。

[131] Frank Dorn, *The Map of Peking Folklore*.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年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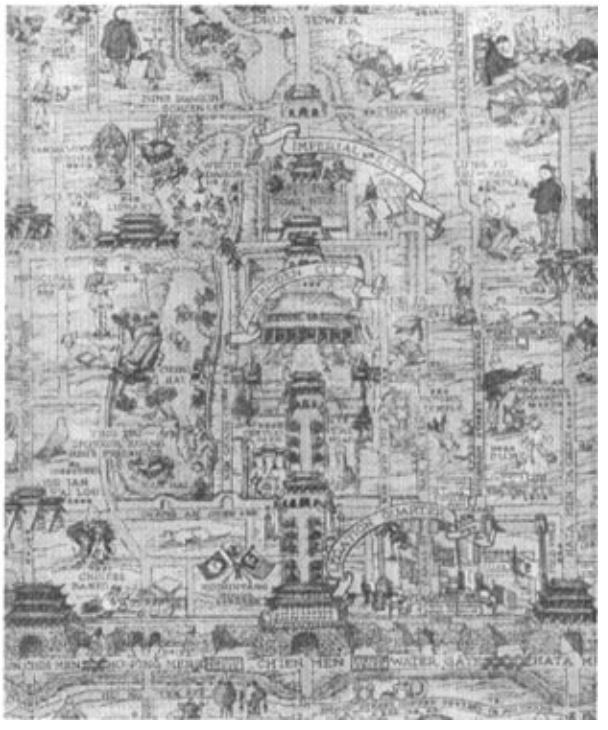

图 8，Map of Peking Folklore（局部），193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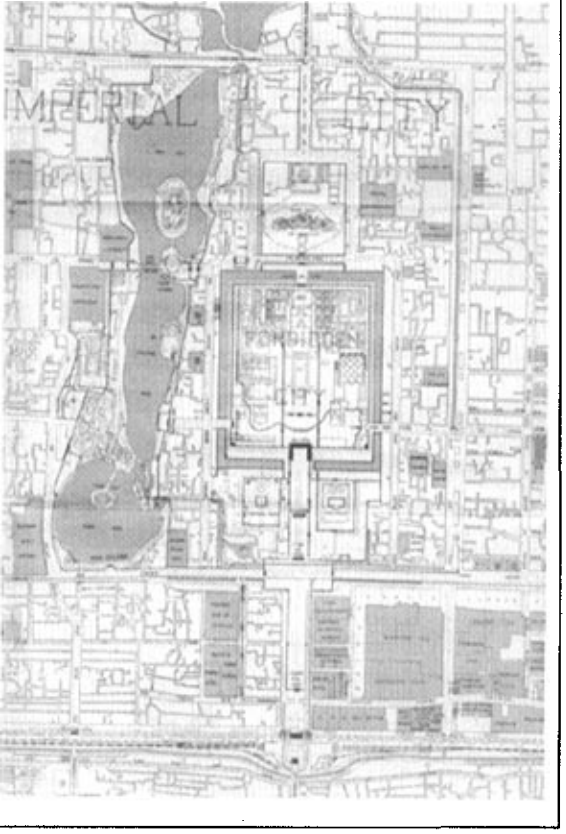

图 9，Plan of Peking（局部），1936 年。

宽泛得多，画面的可读性要强许多。尽管人文地理学研究不免为了研究方便而将研究对象限定在某一范围内，这幅“风俗图”也及时地提醒我们城市空间内容的丰富性，而不只是将城市感知简化为有限的几个类型。

另外一方面，将图 8、图 9 和图 7 进行比较，很容易找出由图 9 的精确测绘，到图 8 的具象描绘，再到图 7 的抽象分布的渐变趋势。如果把测绘地图-城市规划、具象描绘-照片辨别、抽象分布-认知草图等概念一一联系起来，则历史时期城市意象的感知、表达的路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城市规划者通过对空间布局的设计实现其意识形态目的，而建成景观孕育、影响了人的感知，这种感知被投射到行为决策过程中，以认知草图等方式表现出来。

2. 想象地理

毫无疑问，想象已经被接受为人对于地方表达的重要方式。对空间的感知以实体空间为基础，不过，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想象因素在意象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景观既可以是实在的又可以是想象的，所谓实在的景观，是指客观存在于地表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特征的集合；而想象的景观，是指反映在人们头脑中的实在的景观，这些景观只有当人们感知到他们时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它们蕴含着人们的感情因素和文化态度，也并不完全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实在的景观，更多的是一些典型景观的集合，这时它们也可称为意象。”[132]

基于个人感知的公共意象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而当个体想象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时，就近似于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述和意象集合，追寻其背后的想象因素，方可对为某个群体共有的意象有深入的了解。

美国地理学家 Jeremy Foster 在 ***Northward, upward: stories of train travel, and the journey towards white South African nationhood, 1895-1950***[133]中，尝试从“想象地理”（Imaginary Geography）角度解读撰写于 1895-1950 年间关于南非 Cape- to-Rand 铁路的大量的游记（travel book）或记载（accounts）。这条铁路从南端的港口开普敦，向北延伸至高原地区的兰德，原为雄心勃勃的“开普敦-开罗”非洲大陆铁路轴（axis）的一部分，不过后者并没有建成。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关于这条铁路的大量记载中都提到了方向（南-北）和海拔（海滨-高原）两个地理特征，当然有些是以间接的方式提到。作者注意到这些记录中潜藏着一个通过这条铁路旅行的白人群体的集体的想象模式：这条铁路不仅仅只是一个交通通道，更承载了英国白人殖民者对于向北方非洲大陆扩展的雄心，而当这种雄心受阻之后，转而成为对于南非国家身份的一种想象和认同的精神资

[132] 左鹏，《唐诗中的文化景观》。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1 年，P8。

[133] Jeremy Foster, Northward, upward: stories of train travel, and the journey towards white South African nationhood, 1895-1950.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31, 2005: 296-315.

源。它促进路南非由一个地形学上的区域升级为从历史、地理角度都清晰可读的整体，同时维系了文化意义上的（南非的）景观和身份的观念[134]。这条铁路连接了高原的内部的非洲和类似欧洲的海滨港口开普敦，它是殖民者对于南部非洲占有的标志物，超越了铁路本身的实用功能。

这个有趣的例子为我们考察民国北平时期的城市意象要素提供了新的途径，它使得一个问题更加具有讨论的必要："故都"北平形象是否也存在想象的因素？先看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广州女师学生对于北平的印象：

> "从过去的童年直至现在，我听过了各种不同人物口中所描写的北平：祖父口中的背景，有宏丽庄严的宫殿与御园，有超群拔萃的文人和武士，当三场试罢金榜题名的时候，如何地攒花挂锦，赐宴琼林，王公贵人的绣辇如云，名士宿儒的鸿篇似锦，从自身的经验来说，北京，就仿佛是功名利禄追求的目的地；在父亲口中的北京，有慷慨激昂的燕赵悲歌之士，有诚朴浑厚守分安天的顺民，自袁氏称帝以至五四运动前后，如何地青年学生们敲起了洪亮的巨钟，惊破了整个中国昏醉沉沉的迷梦，在历史上灿耀着不朽的光芒，北京，就仿佛是中华民族再度昭苏的发祥地；在珊友口中的北平，有拥土自强野心勃勃的军阀，有夤缘营钻不惜毁家求仕的污吏和贪官，浓厚腐化的气味弥漫着整个暮气沉沉的"死都"，北平，就仿佛是一个空有历史意味和过去的繁荣的古城；最近从冯先生的口中，北平，却又在我幻想的境域中渲染着一层神秘的色彩。"[135]

同一个北平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城市，这很容易让人回想起第二章中所讨论的城市意象同城市实体空间的错位。诚然，城市意象是城市实体空间的衍生产品，但二者错位表明它们绝对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准确地说，人对于这个城市的感知中加入了想象因素，导致他们看到的其实不完全是客观的实体，而是一个真实和幻想并存的北平。

导致北平感知差异的原因还包括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经济收入、生活经历等等。"也许先要承认文化多元，承认有被分割了的属于不同人的城市，有不同人的千差万别的城市印象、城市感觉、城市节奏，才能说得清楚所谓"城市"这玩艺儿吧。"心理时间"、"心理空间"的概念当初引入时，曾被用来扩大传统的"真实性"理解。"[136]比如，反映沦陷时期北平城市生活有一本名为《人鬼杂

---

[134] Jeremy Foster, Northward, upward: stories of train travel, and the journey towards white South African nationhood, 1895-1950.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31, 2005: 296, "shift physiographic region into historically geographically-legible whole", "culturally-constructed ideas about landscape and identity were protected and saved"

[135] 徐舜英，《北游鳞爪》。广州女师"女师丛书"之一，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第201-202页。

[136] 赵园，《北京：城与人》。第194页。

居的北平》[137]的文集，从书名也可看出分享同一城市空间的居民间立场是如何的不同。不过，这些并不影响北平作为一个共同的想象对象——同时也是想象产物——的身份。

1928 年民国首都迁往南京。事实上，迁都事件并不如后来看起来的简单，在当时既引起了国内社会广泛的争议，还牵涉到国际社会的立场。媒体如《申报》，以及学术界都发表了大量关于“迁都”问题的报道或专著，即可以窥其一斑[138]。在迁都成功之后，几乎同时出现了将北平定位为“文化中心”的说法。与这个提法并行于三十年代的，是将北平建设为“观光游览区”的说法，它显然是得到了南京政府支持的建设计划，其民间版本则演变为对于“故都”概念的广泛使用。

显然，当迁都事件被置于国家内部功能分配乃至国际影响的历史背景下，则北平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关系反映出的乃是一种“国家政治地理结构”（a system of national political geography）。H. J. 布里吉认为政治地理学“一方面要研究政治区域的结合系统，国内的地方问题，直至全球的、国家集团的纵向联系；另一方面要从行为论的立场出发，研究小区域的居民决策、行为模式、投票选举等政治区域的横向空间的结合系统。”[139]本文无意对政治地理学深究，不过从北平的个案看来，或许可以说这两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说来就是北平在国家政治地理结构中的角色参与了北平城市意象的生产过程。

在本文所选取的 130 篇散文中，至少 30 篇明确地将北平与其他城市、与其他地区相比较，其中又以北平 vs 上海、北平 vs 南京的比较为著。这种比较，多在一种二元并举的语境中进行，换句话说二者是作为对方的对应面而存在的；由北平和南方城市之间，而扩展为广义上的“南方”和“北方”的比较。上世纪三十年代为此引发了一场“京派”和“海派”之争，牵涉文化界人士之多，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足见这样的“南”“北”分歧已经无法掩饰。

尽管以“京派”和“海派”为名，这场争论却不是狭隘的地域之争。当事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鲁迅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140]此言不虚，“京派”主力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皆来自南方，算得上彻头彻尾的南方人。何以这些南方人背离其籍贯所属，倒作为北方的“京派”率先发难批判“海派”，挑起派系之争？

---

[137] 于力，《人鬼杂居的北平市》。群众出版社，1984 年。

[138] 《申报》1928 年刊登与“迁都”有关的新闻至少有如下几条：《英人亦造迁都空气，何其与日口吻一致》、《李济深主定都南京》、《外人何以不愿迁都南京》、《国都问题已属定局》、《北平无可建都理由》、《新首都确定以后》、《广州市党部力主定都南京电》、《王正廷关于国都之谈话》、《邵力子南桂馨返北谈新都设南京不能变更》等。另外，当时关于建都的专著还有《中国之首都问题》（张其昀，1932），《漫谈集中建都的理由》（洪绂，1933）等。

[139] H.J.布里吉：《系统政治地理学》。转引自王恩涌：《中国政治地理》，第 5 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年。

[140] 鲁迅，《“京派”与“海派”》。见《申报·自由谈》，1934 年 1 月 30 日，署名栾廷石。

这不能不考虑到“南-北”、“京-海”分歧的表象之后所隐藏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近代化、都市化的矛盾的看法，以及微妙的地域情感、想象因素。

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的影响之下起步的，从地域上看又是从东南沿海地区向北部沿海、从东部向中西部内地逐步展开的。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城市：

“这里（上海）已实实在在地是世界上第三个大港口，是中国最大的城市——”

“不是说北京——？”

“北京？哼！完蛋了！听着，上海将成为一个商业之邦，它在世界贸易中的强大地位就如威尼斯一度在意大利的地位一样，它是中国的大门，而我们将要掌握大门的钥匙。”[141]

显然，这段话里充斥着西方人的资本家精神和商业城市观念。近代中国港口城市正是在这种强势的、现代性的西方力量，和国内政治力量、民族工商业力量的共同支配下，得以发展壮大的。这类城市，远不只是上海，但却以上海为最显著的代表，因此每当涉及中国的近代化，则不能不提上海。这是上海这个城市的伟大之处，而它为这荣誉付出的代价就是成为无数来自乡村的知识分子的攻击对象。中国知识分子与乡村的密切关系，是基于近现代中国城市化水平低下的一个简单明确的判断，段义孚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根在乡村[142]。

尽管这些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可能经过都市的，乃至留学的教育，但来自乡村的身份背景却更长久、更深远地伴随着他们，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些知识分子所期望达到的理想，无论是物质生活条件还是精神层面。北平的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的物价之低廉、节奏之缓慢、人情的温暖、乡村城市景观的“和谐”（实际上是低度城市化的特征而已），无不反映出基于乡村农业社会的生活理想，而与港口城市的逐利、匆忙、冷漠、城市景观完全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仍以外国人的观察为例，且不说放弃了好莱坞工作专门来到北平体验东方神话的 George Kates（*The Years That Were Fat*，《丰腴年代》的作者），在一个游览者眼里的北平还是以其文化著称，

“就外国人而言……那些被吸引到北京（注：应为北平）的有钱人，之所以放弃自己祖国优裕的生活来中国，是因为他们深深地喜欢中国文化……他们的

[141] 克利斯多福·纽，《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第 149 页。

[142] Yi-fu Tuan, *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第 106 页，“the Chinese gentry class had solid roots in the country”.

收入大部分不靠中方。传教士由传教团体供给。在大医院里工作的医务人员靠薪水生活。而他们的薪水由诸如“洛克菲勒基金”和北京医学联合基金提供。”[143]

“文化中心”、“文化城”的北平，提供给那些在南方城市中得不到发展空间的知识分子一个不错的去处。三十年代鼎盛时期，北平拥有两个国立研究院、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和医院各一个、超过十所各类高等院校，以及为数众多的新闻媒体、专业学会等。来自中央政府和外国基金会的资助是既没有多少工业、也不是商业港口的北平重要的经济来源，“北平市每年因教育事业而流通的金额，总在两千万元以上”[144]。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即使不是在北平接受教育，也有可能离开南方去北平。在南方日益卷入近代化的潮流，在上海成长为远东最大城市的时候，北平以其文化底蕴、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吸引力，成为在南方不能进入主流、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不错的去处。在北平的安宁祥和的表象之下，知识分子对近代化、城市化带来的种种焦虑选择了逃避的态度，而这种焦虑在上海的作家中不胜枚举[145]。

综合以上分析看来，“京”-“海”、“南”-“北”之分野，其实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取向分野，本无高下之别，最多只是鲁迅所言的“官的帮闲”和“商的附庸”的区别。但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仍然是来自乡村背景，因而在面对近代化、城市化（二者有时可视作同一个过程）浪潮时，适应程度差别很大，一旦不能融入南方主流，则不仅“心远”而且实际上也转移到了“地偏”的北平，继续编织中国式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理想。

现代文学史家也注意到了同样的现象。吴福辉在《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前言中提到，“你会感到京派小说对中国人生范围内的封建文明的嫌恶和现代文明的疑惧，这种心境，显然不同于左翼小说反封建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神圣憎恨和昂扬的战斗姿态，也不同于海派如穆时英小说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空虚哀叹和禁不住的依恋。”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在传统-现代、世界-乡土等等的二元冲突中走向其悲剧色彩的，这一点在赵园那里得到了应证，“乡土感与非乡土感中，寓有中国知识者与生活的联系方式，独有的文化心态。”[146]

虽然祖籍南方，但是知识分子加入了北平的生活经验，便使得其在一种想象的空间架构里选取北方、北平作为自身在地理上的标签。从描写的对象来说，“京派所写的北平与内地城镇，岂不比左翼和海派集中表现的沪杭宁地区和东南沿海较发达的城乡，更象那个正在逝去的大多数人的中国？”这种关注的角度，

---

[143] 菲茨杰拉尔德，《为什么去中国》。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第160页。
[144] 铢庵，《北游錄话》之二。《宇宙风》，第二十期，1936年。
[145] 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5页，“它们象征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像茅盾那样一代的都市作家在这种进程前都表现了极大的焦虑和矛盾心情。”
[146] 赵园，《北京：城与人》。第13页。

使“京派”超越了一种地方的文学流派，而具有了关照全国的眼光，也比现代的、城市色彩的文学容易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京派甚至不能说只是表现北方的，进入他们文学视野的，正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一个‘乡村中国’！”[147]因此，上文提及的知识分子记录中对于北平的近代化、西洋式的建筑的“盲点”，或者说有意的忽略，不难理解，更可见在大尺度上想象因素是如何影响了微观的城市感知。

表现在具体的行为决策上，就是众多的知识分子选择北平、留在北平，并且逐渐采取了基于“故都”北平的价值评判标准。“这些表示很能透露出周作人以及其他居留故都的文人们的一种心态。居留北平，是他们作出的对于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双重选择。”[148]这种选择是对政治和文化的取向而作出的判断，然而这个判断本身却又在不断自我复制、自我强化，以至于对外界物理空间的想象也有深深的投影，“故都”北平和“繁华”上海的对举更其普遍。“京派”、“海派”之争显著地展示了文学趣味如何最终演化成以地理名称来指称的知识分子流派；而尤其当我们注意到“京派”、“海派”之别与知识分子籍贯，甚至居住地，都没有必然的关系时，不能不承认以地理名称区分文化心理认同的巨大的自我复制、自我强化的力量。时至今日，这样的影响如果不是更加强化了，至少并没有衰弱下去。杨东平《城市季风：京派与海派文化》[149]是上世纪末以来对于北京、上海两地文化差异的感性描述和追溯，然而如果不考虑到京沪在整个国家地理结构中的不同角色及其生产过程，任何对于京沪的阐释无疑都是隔靴搔痒，且有断章取义之嫌。

然而，在全球近代化的大势之下，这种乡村式的、传统的、审美的、高雅的“京派”生活终究要面临生死考验。一方面，北平是“一座几乎没有触摸到现代气息而多少有点冷落萧条的城市。作为首都，它的存在理由已经消失，或者几乎消失了。”另一方面，“北京（注：应为北平）是一个梦一般的城市。很少有人明白，用不了多久，这个梦一定会有猛然醒来的一刻。”[150]这个梦没有持续多久，民国的“黄金十年”止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北平知识分子除了少数因各种原因不得不留在沦陷的北平，大多数逃往南方。

1937年8月，老舍在济南遇到了其他几位从北平逃难而来的朋友，如老向、《实报》社长管先生、周君等等，还有杨今甫、沈从文两位先生甚至未及在济南歇脚就直奔南方而去，赵永澄先生则不幸在天津遭毒打……老舍写到一位知识分子的反思，“他没说什么事实，只指出以往知识阶级的错误，就是读书人不明军事，而轻易喊出一致抗战与抗战到底，以致军队未及充分调整，而敌人已先发制

[147]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148] 黄健，《京派文学批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5页。
[149] 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4年。
[150] 菲茨杰拉尔德，《为什么去中国》。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第35和161页。

人。”[151]

需要反思的何止是这些流落异乡、身遭国难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所折射出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许多主题[152]，包括“南”与“北”，“京”与“海”，至今仍不能说已经得到彻底的反思。在此基础上的关于“故都”北平的想象因素也就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审视。

3. 恋地情结（Topophilia）

“恋地情结”是唐晓峰对于“Topophilia”的翻译[153]。更早时候左鹏在其博士论文《唐代诗歌中的文化景观》中将其翻译为“地方倾向”。顾朝林、宋国臣在《北京城市意象空间及其构成要素》中将它译作“亲地情结”，并且论述到，“地理学家对场所(place)的研究情有独钟，段义孚等人提出了‘场所意识’的概念来诠释人与场所间的关系。场所意识是场所的可意象性、象征性以及人的‘亲地情结’(topopholia)的结合。从这种意义来说，亲地情结是指场所和人之间的感情纽带。在特定城市社会地理背景下，场所意识的最重要特征往往是人们对自己家所在地区的依恋。”[154]根据被提出后的使用范围，本文采纳第一种翻译方式。

1990 年段义孚出版《恋地情结》（Yi-fu Tuan: *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一书，该书随即成为段义孚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的经典。段义孚认为“恋地情结”是“人和地或环境之间的情感联系”，或者“广泛的人类同物质环境的情感纽带。”[155]段著从空间的表现形式开始，讨论了环境、景观、文化、城市等因素和恋地情结之间的关系，涉及的众多主题中关于“旅行者”和“本地人”的讨论在本文前文已有提及。

董玥在谈到民国期间，尤其是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对于“故都北平”形象

---

[151] 老舍，《友来话北平》。收入姜德明编《北京乎》，三联书店，1992：第 413 页。

[152] 三十年代的黄金岁月结束之后，抗战和内战极大地打击了北平知识分子的生活。美国人德克·博迪记载了四十年代的情况，“我们在北京的生活，就像是一场奇特的梦。首先，这个城市和 11 年前我们所了解的北京城是那么的相像，可又是那么的不相像。我们过去所认识的人现在还住在这里，可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简直没法和 11 年前相比。那时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住得宽敞，经济条件优越。可现在他们生活拮据，天天在为将来担忧。经历了抗战和内战的 11 年，他们变得又老又苍白。”见《北京日记》1948 年 9 月 26 日，“北京诗歌梦”。东方出版中心，2001：第 17 页。

[153] 唐晓峰，《还地理学一份人情》。见《读书》，2002 年 11 期。

[154] 顾朝林，宋国臣，《北京城市意象空间及其构成要素》。《地理学报》，第 56 卷第 1 期，2001：第 66 页。

[155] Yi-fu Tuan: *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第 4 页，“topophilia is the affective bond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or setting”；第 93 页，“the word “topophilia” is a neologism, useful in that it can be defined broadly to include all of the human being's affective ties with the material environment。”

的运用时，使用了“museumification”（博物馆化）这样一个新创造的词汇[156]。三四十年代北平先后出现了《北平》和《故都》两本意在整理地方史的刊物，时人多篇文章中均提及将北平建设为“观光游览区”。北平市政府关于编制《北平导游概况》的公文也明确提到整顿什刹海地区使之成为公园游览区。不管是“博物馆”还是“观光游览区”，都和“访问者”或“外来者”的角度不可分割。

段义孚认为，“访问者”（Visitor）对于环境的评价本质上是美学色彩的[157]，并且对于一个地方而言，外来者（Outsider）的热情正如其所持的批评的姿态，通常都是表面化的[158]。这两个说法用来解释那个时期知识分子记载中的北平城市印象真的恰如其分。北平在作为同上海、南京对立的“故都”，其形象本身就具有天然的美学特征，北平本身在历史上就曾产生过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这样的经典，有着浓厚的“怀古”情结的根基。另外中国传统城市营造理论、帝国时代的皇家建筑、精致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一切在由带有中世纪色彩的城墙围就的城市里，构成了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共享的对于辉煌文明的想象。[159]而对于北平在国家范围内的城市地理格局中的地位，却缺乏深刻的反思。一面是反思的缺席，一面是沉醉于北平所代表的文化中心形象，这一点导致后来对于北平的继承和利用过程中不断发生令人遗憾的失误，其影响近日仍然不绝。

段义孚并且提到，事实上只有访问者（特别是旅行者）才有观点（Viewpoint），他通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过程获得自己的看法；而本地人（Native），相反地，由于生活于其中、沉浸于其中而对环境有着复杂的看法[160]。这一点也在董玥对民国北京的文学分析中得到应证。因为各种不同原因生活在北平的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共享着一种特性：“生活的中心是民国的北京，一个已然转型的城市。在空间概念上，他们的北京也有所不同：他们钟情的北京并非本地人情之所系。”如上文曾提及，即使在对于北平的城市空间消费上，知识分子阶层也与民众有着绝大的不同。

知识分子喜爱的北平，是一个各种人物和谐并存的世界。这种角度更像是一种观光客而不是本地居民：

> “这里也是复杂的——有复杂的人类。律师和犯人，警察和侦探，窃贼和窃贼的保护人，叫化子和叫化头脑，有圣人、罪犯、回教徒、西藏的驱鬼者、预言家、拳教师、和尚、娼妓、俄国和中国的舞女、高丽的走私者、画家、哲学家、诗人、古董收藏家，青年大学生，和影迷。还有投机政治家，

---

156 Madel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第 15 页.

157 Yi-fu Tuan: *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第 64 页。

158 Yi-fu Tuan: *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第 65 页。

159 铢庵，《北游錄话》之一。《宇宙风》，第 19 期，1936 年。

160 Yi-fu Tuan: *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第 63 页。

退隐的旧官僚，新生活的实行者，神学家，曾为满清官太太而沦为仆役的女佣人。”[161]

如果说上海的“十里洋场”是中国近现代城市的范本，同时在更大的尺度上，也是中国当时最具“世界都市”（Cosmopolitan City）特征的城市。而通常被作为其对立面的北平，其实在人员的复杂性上完全可以与之并论，“北平之五方杂处、良莠不齐，也并不亚于他处”[162]。实际上这还是“故都”身份继承的遗产，可惜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至于近数十年来北京在城市建设上的不遗余力，特别是近十年来力图创造“全球都市”形象，实际上却既不新鲜，也算不得“对‘国都’想象的超越性的尝试”[163]。

那么为什么只有上海能作为近现代的大都市，而北平始终不过是倚赖国内外财政支持的消费城市？原因或许在于城市化、近代化所带来的分工、隔离，只不过在上海是外国人以及商贾达人对于城市平民的隔离，而北平是官员、记者、教授、学生等同市民的隔离罢了。这种隔离建立在同一国度内部的阶级分层上，而不如港口城市的中外、民族、现代-传统的隔离那样醒目。

不过这种隔离并没有立即显示出它的弊端，相反北平倒是提供了知识分子一种温馨、安谧的感觉。不少到过北平的作家在文章中认北平作“第二故乡”，比如俞平伯、骞先艾和毕树棠等等。无论如何北平所提供的“故乡”想象资源是一种奇特的现象，除了广义的“恋地情结”无以解释。所谓广义的“恋地情结”不只是指人和地之间的情感联系，更可以参考在当时人记载中不断出现的“中国本位”来理解。

“我到底是中国人，觉得“中国本位”有时是必要。”[164]

“其中有不少的公子王孙，他们过去享受着优裕的生活，也就养成一种舒适安闲的习惯。现在虽然没落了，然而环境还是一样的美丽，习惯还是照旧的不紧张，十足的表现出中国本位文化来。”[165]

“夏布长衫我随身带得有，草帽可以不戴．脚下这双白皮鞋却成问题，赤足也不像话。我连夜去青云间花了九毛钱，买了一双青布鞋，才完成了这十足的“本位文化”装。”[166]

---

[161] 林语堂，《迷人的北平》。收入姜德明编《北京乎》，三联书店，1992：第511页。
[162] 铢庵，《北游錄话》之二。《宇宙风》，第20期，1936年。
[163] 持所引意见的学者大有人在，如张颐武《“国都”与“全球都市”》，收入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
[164] 果轩《北京的豆汁儿之类》。收入梁雨健编《故都北平社会相》，重庆出版社，1989：第103页
[165] 孟起《蹓跶》。收入梁雨健编《故都北平社会相》，重庆出版社，1989：第121页
[166] 石敢当《关帝庙求签记》。收入梁雨健编《故都北平社会相》，重庆出版社，1989：第152页

简言之，北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而知识分子记载中的恋地、恋乡土、恋中国文化情感，几乎全部投射在北平身上，“故都”身份不但没有消减这种情绪，相反对于它倒有莫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南京，特别是上海，被作为对应面而出现。“北京不只是它自身——在承受文化批评时它不只是自身，在被眷恋时它也不只是自身。”[167]

虽然不算是新发现，施坚雅很早也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与乡土、故乡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且提出有趣的看法。“在文人的心目中，既存在着城市的禽兽世界和乡村的禽兽世界，同时也存在着乡村的田园牧歌和城市的理想国。就是这种二元论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尽管城市生活有诸般危险，士大夫仍有颇高的城市成分，又为什么尽管城市有诸般吸引力，他们大多数却过着乡居生活。”[168]这种对于城市生活的矛盾态度和士绅身份对居住选择的背离，在面对近代西方带来的城市化、现代化浪潮时，既显得缺乏认识，又显得准备不足。说到底，“传统中国有没有独特的城市文化？……文人住所所在地如能确有把握地弄清是在乡村或在城市时，其文化是否有重大差异呢？”[169]可惜的是，这些问题几乎没有肯定的回答。

因而毫不奇怪，通过我们分析的“新知识分子”对于北平的“故乡”式的眷恋，糅合了对于南方故乡的空间上的亲切感，更多的则是对一种抽象的文化象征的矛盾的态度。北平提供了知识分子理想的生活环境，却也时时刻刻处在“危城”的阴影下。由官方、媒体和教会提供的资金支持使得他们能够相对独立于北平真正的日常生活之外，以“外来者”、“访问者”的优游心态观览故都北平，欣赏皇家的建筑，享受较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和低廉的费用，这一切给了知识分子一种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在全球现代性的背景下是如此脆弱，在近代化的日本的进攻下迅速瓦解。因此，张仲礼对京派与海派作了一个恰当的评价：

> “京派是否只是一种社会基础脆弱、易于流徙的贵族精英文化，它会随战争和政局的变幻而存亡？而海派则是否是一种整体性的生存方式，日军除了对它进行掠夺和占领之外，很少能增减什么，因为它与社会结合，是一种稳定的民众文化？”[170]

在以往的北京史研究中，曾经对于北京（北平）是否是上海的产物做过探

---

[167] 赵园，《北京：城与人》。第80页。
[168]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7页。
[169]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7页。
[170] 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38页。

讨，反思北平城市认同所依赖的要素，这些要素包括“文化先锋的美名、媒体功能的霸权和政治势力的操纵”[171]。因为“五四”而辉煌的北平到三十年代时无疑已经逐渐失去其在国家政治地理结构中的首位作用，而处在一个“历史的缝隙”，实际上是被边缘化了，无外乎知识分子在这里容易感到“落寞和失落”[172]。面对以“他者”形象出现的南京、上海乃至广义的南方，北平以其文化中心的骄傲维护着它的城市认同，并且由被这个城市形象吸引而来的知识分子反哺强化了。

另一方面，新知识分子并不排斥北平城市中新的、现代的因素。依据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设计、改建的设施包含在这些知识分子最热衷的区域之内。郁达夫喜欢在北京饭店的软木地板上跳舞，而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吸引的知识分子更多，北海提供了游艺场所还有图书馆。知识分子强调的北平的文化象征，恐怕更多是一种“姿态”。正如段义孚在对于“访问者”感知特征的总结中提到的一样。简单说来，“当他们（新知识分子）认北京为“故乡”的时候，背景中永远会有上海的影子”[173]；老舍说“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174]，这话其实也适用于其他的“京派”知识分子。

至于从南方去到北平的知识分子，是怎样转变视角反倒以南方为“他者”，杨晦早在四十年代就有过深刻的讨论：

> “五四运动却是发生在北京的，这好像是京派的光荣成绩。其实不然。五四运动正是海派势力伸张到北京去，突破了京派的士大夫传统的结果。所以，等后来伸张到北京的海派势力一部分又南下了，另一部分留在北京的，好像江南之橘，到了淮北就变成了枳的情形一样，反倒接受了士大夫的传统。于是所谓京派的声势才张大起来，这才造成了后来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在京派抉着五四运动的余威，威吓海派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对于京派的学者作家已经失去五四运动的内容，对于他们已经空虚，只剩下一个空壳供他们玩弄活着用一个他们最爱用的术语，供他们“欣赏”的时候。”[175]

三十年代正是“京派”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这段话无疑戳破了关于“京派”、关于“迷人的北平”的种种神话，而直揭其被边缘化后的尴尬处境。

到这里，本文对于1928-1937年期间北平城市意象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的讨论也基本结束。

---

[171] 戴沙迪，《北京是上海的产品吗？》。收入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第237页。

[172] 张洁宇，《“边城的荒野留下少年的笛声”——19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的城市记忆与文化心态》。收入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第307-325页。

[173] 董玥，《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收入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第243页。

[174] 老舍，《想北平》。收入姜德明编《北京乎》，第409页。

[175] 杨晦，《京派与海派》。收入《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22页。

结语

1928-1937年间的北平城市意象研究以城墙内为空间范围，以内城南城墙为边界，以正阳门为节点，以正阳门和景山为标志物，以通过城门的街道为道路，辅以商业街，连接商业区、园林区和宫殿区域。北平城市空间的基本以皇城为中心对称分布，但是空间要素分布内城比外城为众，以中轴线划分，则西半部较东半部偏重。

对北平城市空间的认知受到了城市-乡村、西方影响-中国本位、知识分子-地方居民、南方-北方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并不完全是对于实体空间的直观反映。上述各种因素都参与了北平城市意象空间的建构过程。通过从感知表现、想象因素、恋地情结等角度入手的分析，可以初步阐释知识分子阶层心目中的北平城市意象，并且解释这种城市意象和北平城市实体之间的叠加和错位现象。

利用文学材料进行人文地理学研究是已被广泛采用的方法。较之其他材料，文学材料数量多，获取方便，描述性强，对于研究历史时期的城市空间感知非常有利。采用文学材料同样存在风险，单纯依赖文学材料容易发生偏差，是不全面的。不过，人文地理学所关注的“人”的因素，由于人的因素完全可能导致对于城市感知的偏差甚至扭曲。这一点在本文中已有提及，比如北平新旧知识分子之间、知识分子和市政机构之间、南北方知识分子之间，对于北平城市空间感知和理解的巨大差异。

特别是，通常来说参与文学书写的人大多受过良好教育、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有能力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旅行，从数量上说却属于同时代北平城市居民的少数群体。如果简单将知识分子所感知的城市意象等同于该时期的群体性城市意象，则有以偏概全之弊。为了弥补这个潜在的漏洞，本文已经尽量使用多样化的材料来对从文学材料中总结出的北平城市意象进行校正。在未来的研究中，如果能够引入更多当时人的日记、回忆录、手绘地图等材料，或许可以进一步完善本文所尝试的讨论。

此外，限于本文的研究范围和篇幅，仍有不少有趣的内容未及展开。比如根据1935年北平市政府主持测定的《北平市内外城水平表》，可以构建出相当完整的北平内外城高程网络，探讨这个三维空间同城市意象空间的异同应该能拓展对于北平城市意象的理解。

总之，研究北平城市意象不管是对北平城市地理空间，还是对北平城市史，或是对使用文学材料进行历史城市意象研究方法的认识和反思，都应当更上层楼。

附录：130 篇 1928-1937 年间关于北平的散文样本

周作人	北平的春天	朱自清	潭柘寺戒坛寺
周作人	北平的好坏	朱自清	回来杂记
冰心	墨庐试笔	齐同	一二九前后
鲁迅	《北平笺谱》序	碧野	募捐
俞平伯	进城	钦文	菜市口
沈从文	北平的印象和感想	曹聚仁	京师坊巷志
陈学昭	忆北平	废名	北平通信
朱湘	北海纪游	毕树棠	北平话里的比喻
朱湘	胡同	徐霞村	北平的巷头小吃
焦菊隐	西望翠微	罗念生	大都
刘半农	北大河	林语堂	迷人的北平
萧乾	古城	朱光潜	慈慧殿三号
缪宗群	夜过御河桥	朱光潜	后门大街
巴金	平津道上	盛成	一个洋车夫的暴卒
巴金	一个车夫	盛成	北平的天坛
郑振铎	访笺杂记	许地山	上景山
郑振铎	北平	许地山	先农坛
吴伯箫	话古都	许地山	忆卢沟桥
吴伯箫	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钱歌川	飞霞妆
老向	危城琐记	钱歌川	游牧遗风
老向	难认识的北平	梁实秋	北平的街道
端木蕻良	肖伯纳到北平	陆蠡	囚绿记
郁达夫	故都日记	萧红	北平书简
郁达夫	故都的秋	王西彦	和平的古城
郁达夫	北平的四季	辛不留	这一日的北平
蹇先艾	城下	蔻娟	五月二十一日
蹇先艾	平津道上	莫言	金刚的帽子
姚克	天桥风景线	Y Cheng Ze	文化城的一日
姚克	北平素描	韩恩钿	妙峰山进香
徐許	北平的风度	芍而非	送别游艺会速写
宋春舫	北平	李行	看了“从纽约寄来的信”以后
宋春舫	我不小觑平剧	丁非	这一日
闻国新	北平的说书	张效华	青年微弱喊声的又一韵
林庚	北平的早晨	奈口	银行的早晨
老舍	想北平	牛生	接见
老舍	友来话北平	无名	狱中的一日
老舍	兔儿爷	丽丽	逮捕
朱自清	初到清华记	武陵	消息
朱自清	松堂游记	昭琛	慰劳大会

郝维佩	门头沟的五·二一	任浩	西郊两大学
朝英	北平的气候	徐崇寿	北平的公寓
钟栻	古城古学府	何容	公寓里的风波
血因	北平男女同校之一斑	八六老人	北平话旧
驯羊	北平传说	陶在东	闲话中华门
毕树棠	北京话里的歇后语	王西稔	赏花记
李素	北平的歌谣	茂村	我恨自己
敝芾	从厂甸买书说到北平的旧书业	夏藕	裁判
魏兆铭	北平的公园	戴自俺	孩子们的辩论
吞吐	北平的三多	谢兴姚	中山公园的茶座
吞吐	北平的洋车夫	太白	北平的市场
柳絮	北平的乞丐生活	衷若霞	天桥
古月	拘留所速写	刘小蕙	打小鼓的
铢庵	北游録话之一	果轩	北京的豆汁儿之类
铢庵	北游録话之二	张中岳	北京的窝窝头
铢庵	北游録话之三	应思	北京的腊八粥
铢庵	北游録话之四	吕方邑	北平的货声
铢庵	北游録话之五	孟起	蹓跶
铢庵	北游録话之六	陈启选	北平早晨的调嗓子
铢庵	北游録话之七	张玄	北平的庙会
铢庵	北游録话之八	王言一	白云观庙市记
铢庵	北游録话之九	老兰	旧都的旧年
铢庵	北游録话之十	杨德瑞	北京的旧式结婚
何容	北平的风水	石敢当	关帝庙求签记
谢悯生	故都的圆明园之兴废谈	程心芬	北平的公寓
金容	北平的土药店	钟栻	我的公寓生活

参考书目

民国书刊：

京都市政公所，《京都市政汇览》。北京：京华印书局，民国八年。

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北平：社会调查所、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

时敏女士，《北海闲詠》。北平：北平震东图书馆，民国二十一年。

茅盾，《中国的一日：北平·天津》。上海：上海书店，民国二十四年。

徐舜英，《北游鳞爪》。广州：广东省立女师“女师丛书”，民国二十四年。

北平市政府秘书处，《旧都文物略》。北平：故宫印刷所，民国二十四年。

张江裁，《北平天桥志》。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民国二十五年。

北平市政府，《北平市统计览要》。民国二十五年。

《宇宙风》杂志第19-31期。上海：宇宙风社，民国二十五年。

陶亢德，《北平一顾》。上海：宇宙风社，民国二十七年。

北平故都文物研究会，《故都》。民国三十五年。

王浩，《北平去来》。前线日报，民国三十八年。

市政档案：

北京档案馆档案，全宗号J1，目录号4，卷14：“北平长途汽车管理局概况（附线路略图一张）”，民国二十四年。

北京档案馆档案，全宗号J1，目录号4，卷16：“工务局呈送城郊地图”，民国十八年。

北京档案馆档案，全宗号J1，目录号4，卷46：“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关于会编北平导游概况的训令”，民国二十三年。

北京档案馆档案，全宗号J1，目录号4，卷51：“工务局关于市政处七建设计划的意见及图表”，民国二十四年。

文集和专著：

林海音，《城南旧事》。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

于力，《人鬼杂居的北平市》。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年。

杨晦，《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王玲，《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

北京市政协，《北京往事谈》。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

梁雨健，《故都北京社会相》。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37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

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
成善卿，《天桥史话》。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
张仲礼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京派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姜德明，《北京乎》（上、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
老舍，《骆驼祥子　离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上海：东方出版社，1994年。
王恩涌，《文化地理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许学强，《城市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袁熹，《北京城市生活史》。北京：开明出版社，1997年。
刘仰东，《3 0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北京：西苑出版社，1998年。
北京市档案馆，《民国时期北平市工商税收》。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
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第78页。
北京大学，《北京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余棨昌，《故都变迁记略》。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蔡玉洗，《南京情调》。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余钊，《北京旧事》。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
侯仁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张伟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王均，《清末民初北京的政治风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张伟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北京市政协，《北京文史资料精华——艺林沧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北京市政协，《北京文史资料精华——风俗趣闻》。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北京市政协，《北京文史资料精华——文苑撷英》。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吴建雍、赫晓琳，《宣南士乡》。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上海百年文化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
黄健，《京派文学批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5页。
《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下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
严云受，《诗词意象的魅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

廖克，《地图学的研究与实践》。北京，测绘出版社，2003 年。
于润琦，《文人笔下的旧京风情》。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年。
王永斌，《北京的关厢乡镇和老字号》。上海：东方出版社，2003 年。
王恩涌，《中国政治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年。
张复合，《北京近代建筑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
陈平原、王德威，《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邹仲之，《抚摸北京：当代作家笔下的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5 年。
谢其章，《邓云乡讲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

论文：

李郇、许学强，《广州市城市意象空间分析》。见《人文地理》，1993 年 8 卷 3 期。
杨东平，《“京”“海”两派的文化冲撞》。见《文汇报》1994 年 8 月 15 日。
[日]妹尾達彦，《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见《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马正林，《论中国的城墙与城市》。见《历史地理》第 13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林玉莲，《武汉城市意象的研究》。见《新建筑》，1999 年第 1 期。
王均，《从传统向近代过渡的都市：北京城的空间转变》。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0 年。
顾朝林、宋国臣，《北京城市意象空间调查与分析》。见《规划师》，2001 年 17 卷 2 期。
顾朝林、宋国臣，《北京城市意象空间和构成要素研究》。见《地理学报》，2001 年 56 卷 1 期。
顾朝林、宋国臣，《城市意象研究及其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见《城市设计》，2001 年 25 卷 3 期。
张旭东，《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与现代神话的消解》。见《文学批评》，2002 年 5 期。
王均，《近现代北京城市意象的文学感知》。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17 卷 2 辑，2002 年。
潘晟，《感受与事实之间——宋人诗文所记汉水中下游河流景观及其解释》。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17 卷 2 辑，2002 年。
陈平原，《“五方杂处”说北京》。见《书城》，2002 年第 3 期。
唐晓峰，《还地理学一份人情》。见《读书》，2002 年 11 期。
陈惠英，《现代诗‘景’的符号-经验、记忆、时间、空间》。见台湾《师大学报》，2002 年。
梁文宁，《近代诗歌意象与近代文人心态》。《学术论坛》，2002 年第 3 期。
周尚意，王海宁，范砾瑶，《交通廊道对城市社会空间的侵入作用——以北京市德外大街改造工程为例》。见《地理研究》2003 年 1 月，第 22 卷第 1 期。

汪原，《凯文·林奇<城市意象>之批判》。见《新建筑》，2003 年 3 期。

朱玉麒，《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见荣新江编《唐研究》第 9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杨冬梅，《民国时期南京的市民文化研究》，见《中华民国史新论》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卷。北京：三联书店，2003 年。

左鹏，《社会空间的文化意象——以乐府诗<长安道>为例》。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18 卷 4 辑，2003 年。

樊如森，《论近代中国北方外向型经济的兴起》。见《史学月刊》2003 年第 6 期。

崔育新、邱文明，《福州城市中心区可印象性分析》。福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 年，第 31 卷，第 4 期。

张洁宇，《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现代主义诗人文化心态分析》。见《北京社会科学》，2004 年 1 期。

林涓、张伟然，《巫山神女：一种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见《文学遗产》，2004 年第 2 期，

朱克川，《韩国迁都与“地域情结”》。见《中国国家地理》，2004 年第 9 期。

李刚，《中古乐府诗中的地理意象》。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5 年。

董玥，《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见陈平原、王德威，《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译著：

[瑞典]奥斯伍尔德·喜仁龙著，许永全译，《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5 年。

[英]克利斯多福·纽，《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年。

[英]R.J.约翰斯顿著，唐晓峰等译，《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 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9 年。

[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

[德]基希，《秘密的中国》。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 年。

[美]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 年。

[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年。

[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中]林语堂著，赵沛林、张钧译，《辉煌的北京：中国在七个世纪里的景观》。西安：陕西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

[澳]菲茨杰拉尔德，《为什么去中国》。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年。

[加]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美国大都市的生与死》。译林出版社，2005 年。

外文著作：

Jeremy Foster, *Northward, upward: stories of train travel, and the journey towards white South African nationhood, 1895-1950.*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31, 2005: 296-315.

L. C. Arlington & William Lewisohn: *In Search of Old Peking*.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35.

Yi-Fu Tuan: *Topopho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4

George Kates: *The Years That Were Fat*. MIT Press, 1967.

Robert P. Larkin, Gary L. Peters: *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Human Geography*,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83.

Hedda Morrison: *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Madele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UC Berkeley Press, 2003.

Yi-Fu Tuan: *Humanistic Geography: a Personal View*. A paper presented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June 4, 2005.

后 记

在上海做北京的题目，不是个轻松的决定。如果没有老师、同学、朋友、家人的指导、鼓励和督促，我可能不会坚持下来。

感谢我的导师张晓虹副教授。拙文自构思开始，张老师一直不遗余力地赐予指导，提供参考书籍，联系相关学者，直到最后的亲笔修改，这篇论文也凝结了她的心血。对我来说，张晓虹老师不仅是学术上的导师，也是一位洞悉事理、温和耐心的长者，和张老师的交谈愉快而使人收获甚多。我也要感谢张老师给我的自由，使我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按自己的兴趣去做，而又并未远离本课题。

感谢满志敏教授、张伟然教授、李晓杰副教授、安介生副教授、朱海滨副教授、杨伟兵老师、杨煜达老师对于拙文的指导。张伟然教授曾多次深入、细致地做示范分析。

感谢周振鹤教授、满志敏教授、侯杨方副教授，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我给予了慷慨的帮助。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周尚意教授、中国测绘科学院王均研究员对我的帮助和指导，王均先生还曾寄来他的博士论文。

03 级硕士班是我经历过的最融洽的班级之一，为大家服务是我的光荣，而你们更是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牟振宇、陈琍博士，梁志平、余思彦、孙景超博士和李强博士都曾在学业上给我重要帮助，谢谢！

我的家人是我身后最坚定的支持力量，我比其他任何人更理解一个本分、传统的农民家庭走向城市化的不易。因此，当你们关注我、理解我、支持我的时候，我也愿将每一点进步献给你们。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丁雅芹 日期：2006.6.3.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复旦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丁雅芹 导师签名：[illegible] 日期2006.6.3

北平历史城市意象研究：1928-1937

作者： 丁雁南
学位授予单位： 复旦大学

万方数据 WANFANG DATA 文献链接

参考文献(119条)

1. 民国书刊

2. 京都市政公所 京都市政汇览 1919

3. 陶孟和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 1930

4. 时敏 北海闲詠 1932

5. 茅盾 中国的一日:北平·天津 1935

6. 徐舜英 北游鳞爪 1935

7. 北平市政府秘书处 旧都文物略 1935

8. 张江裁 北平天桥志 1936

9. 北平市政府 北平市统计览要 1936

10. 查看详情 1936(19-31)

11. 陶亢德 北平一顾 1938

12. 北平故都文物研究会 故都 1946

13. 王浩 北平去来 1949

14. 市政档案

15. 北平长途汽车管理局概况(附线路略图一张) 1935

16. 工务局呈送城郊地图 1929

17. 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关于会编北平导游概况的训令 1934

18. 工务局关于市政处七建设计划的意见及图表 1935

19. 文集和专著

20. 林海音 城南旧事 1983

21. 于力 人鬼杂居的北平市 1984

22. 杨晦 杨晦文学论集 1985

23.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 1986

24. 王玲 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 1988

25. 北京市政协 北京往事谈 1988

26. 梁雨健 故都北京社会相 1989

27.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编 1989

28. 金受申 老北京的生活 1989

29. 成善卿 天桥史话 1990

30. 张仲礼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1990

31.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京派小说选 1990

32. 姜德明 北京乎 1992

33. 老舍 骆驼祥子 离婚 1994

34. 杨东平 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1994

35. 王恩涌 文化地理学 1995

36. 史明正 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 1995

37. 韩光辉 北京历史人口地理 1996

38. 许学强. 周一星. 宁越敏 城市地理学 1997

39. 袁熹 北京城市生活史 1997

40. 刘仰东 30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 1998

41. 北京市档案馆 民国时期北平市工商税收 1998

42. 马正林 中国城市历史地理 1998

43. 北京大学 北京史 1999

44. 余棨昌 故都变迁记略 2000

45. 蔡玉洗 南京情调 2000

46. 高恒文 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 2000

47. 余钊 北京旧事 2000

48. 侯仁之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 2000

49. 张伟然 湖北历史文化地理 2000

50. 王均 清末民初北京的政治风云 2000

51. 施坚雅. 叶光庭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2000

52. 张伟然 湖北历史文化地理 2000

53. 北京市政协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艺林沧桑 2000

54. 北京市政协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风俗趣闻 2000

55. 北京市政协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文苑撷英 2000

56. 吴建雍. 赫晓琳 宣南士乡 2000

57. 赵园 北京:城与人 2002

58. 上海百年文化史 2002

59. 黄健 京派文学批评研究 2002

60. 查看详情 2003

61. 严云受 诗词意象的魅力 2003

62. 廖克 地图学的研究与实践 2003

63. 于润琦 文人笔下的旧京风情 2003

64. 王永斌 北京的关厢乡镇和老字号 2003

65. 王恩涌 中国政治地理 2004

66. 张复合 北京近代建筑史 2004

67. 陈平原. 王德威 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 2005

68. 邹仲之 抚摸北京:当代作家笔下的北京 2005

69. 谢其章 邓云乡讲北京 2005

70. 论文

71. 李郇. 许学强 广州市城市意象空间分析 1993(03)

72. 杨东平 "京""海"两派的文化冲撞 1994

73. 妹尾達彦 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 1995

74. 马正林 论中国的城墙与城市 1996

75. 林玉莲 武汉市城市意象的研究[期刊论文]-新建筑 1999(1)

76. 王均 从传统向近代过渡的都市:北京城的空间转变 2000

77. 顾朝林. 宋国臣 北京城市意象空间调查与分析[期刊论文]-规划师 2001(2)

78. 顾朝林. 宋国臣 北京城市意象空间及构成要素研究[期刊论文]-地理学报 2001(1)

79. 顾朝林. 宋国臣 城市意象研究及其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 2001(03)

80. 张旭东 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与现代神话的消解[期刊论文]-文学评论 2002(5)

81. 王均 近现代北京城市意象的文学感知 2002

82. 潘晟 感受与事实之间--宋人诗文所记汉水中下游河流景观及其解释 2002

83. 陈平原 "五方杂处"说北京 2002(03)

84. 唐晓峰 还地理学一份人情[期刊论文]-读书 2002(11)

85. 陈惠英 现代诗'景'的符号-经验、记忆、时间、空间 2002

86. 梁文宁 近代诗歌意象与近代文人心态[期刊论文]-学术论坛 2002(3)

87. 周尚意. 王海宁. 范砾瑶 交通廊道对城市社会空间的侵入作用--以北京市德外大街改造工程为例[期刊论文]-地理研究 2003(1)

88. 汪原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之批判[期刊论文]-新建筑 2003(3)

89. 朱玉麒 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 2003

90. 杨冬梅 民国时期南京的市民文化研究 2003

91. 左鹏 社会空间的文化意象--以乐府诗<长安道>为例 2003

92. 樊如森 论近代中国北方外向型经济的兴起[期刊论文]-史学月刊 2003(6)

93. 崔育新. 邱文明 福州城市中心区可印象性分析[期刊论文]-福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3(4)

94. 张洁宇 20世纪30年代北平现代主义诗人文化心态分析[期刊论文]-北京社会科学 2004(1)

95. 林涓. 张伟然 巫山神女:一种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期刊论文]-文学遗产 2004(2)

96. 朱克川 韩国迁都与"地域情结"[期刊论文]-中国国家地理 2004(8)

97. 李刚 中古乐府诗中的地理意象[学位论文]硕士 2005

98. 董玥 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 2005

99. 译著

100. 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许永全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1985

101. 克利斯多福·纽 上海 1987

102. R J 约翰斯顿. 唐晓峰 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 1999

103. 施坚雅. 叶光庭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2000

104. 基希 秘密的中国 2001

105. 德克·博迪 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 2001

106. 凯文·林奇. 方益萍. 何晓军 城市意象 2001

107. 李欧梵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2001

108. 林语堂.赵沛林.张钧 辉煌的北京:中国在七个世纪里的景观 2003

109. 菲茨杰拉尔德 为什么去中国 2004

110. 简·雅各布斯.金衡山 美国大都市的生与死 2005

111. 外文著作

112. Jeremy Foster Northward,upward:stories of train travel,and the journey towards white South African nafionhood,1895-1950 2005

113. L C Arlington.William Lewisohn In Search of Old Peking 1935

114. Yi-Fu Tuan Topopho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and values 1974

115. George Kates The Years That Were Fat 1967

116. Robert P Larkin.Gary L Peters 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Human Geography 1983

117. Hedda Morrison 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 1985

118. Madele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2003

119. Yi-Fu Tuan Humanistic Geography:a Personal Hew 2005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53770.aspx